

理論與當代戰爭系列

911專輯

NO.

1

恐怖主義的精靈

尚·布希亞

L'ESPRIT DU TERRORISME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JEAN BAUDRILLARD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 策劃 朱元鴻 主編、校閱 邱德亮 黃宏昭 譯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JEAN BAUDRILLARD

在每個宰制與衝突的過程裡都鍛造出一個祕密共謀，
在每個共識與均勢的過程裡都打製出一個祕密對抗。

恐怖主義可以被詮釋為一種表現：

一個所向無敵的強權其內在的解離錯亂，一個世界體系內在於其自身的遍在暴力。
因此想要將它當作客觀的邪惡來消滅，既是妄想也是很荒謬的，
因為它就是強權對其自身所宣告的懲罰。

如果恐怖主義是邪惡——就形式而言它當然是，卻絕不是喬治·布希所指的那種意思——
那麼這種邪惡的智慧正是我們需要的：洞察這個世界秩序的內在痙攣。
恐怖主義既是其痙攣發作的事件時刻，也是其形象的反饋。
——布希亞《邪惡的智慧或暗約的清澈》

在911後的單頂烏雲之下，布希亞的一系列寫作聚焦於政治
(或是他所謂「超政治」[supra-political]) 議題：全球權力及其召喚出來的抗拒形式。
從紐約世貿雙塔的災難事件，到巴格達阿布格萊卜地牢的虐囚影像，
布希亞挑釁的評論不僅再度註解了它精闢的理論觀點，
例如「客體反諷」、「邪惡的透顯」、「理論做為對於實在的挑戰」，
也預見並守候著我們眼前持續發生的世界政治事件與局勢。

ISBN978-986-7252-36-4



9 789867 252364

RH1098

NT\$200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

尚·布希亞 | Jean Baudrillard | 作者

法國當代重要的思想大師。1929年生於理姆斯 (Reims)，1966年至1987年任教巴黎第十大學 (巴黎南特大學) 教社會學。他主要討論符碼、擬像及擬像物、消費社會等議題。著有《象徵交換與死亡》、《沉默大眾》、《物體系》、《消費社會》、《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酷回憶》、《擬仿物與擬像》等書。

朱元鴻 | 主編、校閱者

美國德州奧斯汀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召集人。研究領域包括社會思想史、當代社會理論、文化研究、都市民族誌。著作有《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等。

邱德亮 | 譯者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明研究所博士。現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品味歷史與社會學、飲食文化史、古代養生術、法國文化史、差異文化研究、法國當代思潮、史學理論與方法、歷史寫作研究。

黃宏昭 | 譯者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理論與當代戰爭」叢書

從荷馬的《伊里亞得》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戰爭始終是史學與文學著迷的現象。苦難與勇武，榮耀與恐怖，力量與機會，悲劇與憐憫……少有其他事物如戰爭這般恆常、頻繁而複雜地體現人性。

組織暴力手段的能力，徵斂資源的行政效率，在國際體系中進行軍事競爭，是現代國家崛起於歐洲的主要因素。主權、國族認同，透過戰爭而成就。為軍事動員而徵兵斂稅，不得不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是促成民主的契機。現代國家、產業經濟、科學技術、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少有其他事物如戰爭這般全面而深刻地關聯於現代性。

廿世紀末的後冷戰時代，廿一世紀的當下與未來，戰爭的面貌如何不同？波灣、科索夫、911、阿富汗、伊拉克……核生化電的軍事科技、全球即時的新聞影像，如何改變了戰爭的時空與政治？在新奇武器評介、時事新聞報導之外，在台灣的我們這一代，能夠深入理解影響我們存在方式的當代戰爭嗎？「理論與當代戰爭」叢書為讀者介紹關注當代戰爭最為精闢的理論性思考。

911專輯

1. 恐怖主義的精靈
尚·布希亞

2. 歡迎光臨真實荒漠
斯拉維·紀傑克
即將發行

3. 零度地面
保羅·維希留
即將發行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JEAN BAUDRILLARD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SLAVOJ ŽIŽEK



GROUND ZERO
PAUL VIRILIO



COVER:
WANG ZHI HONG DESIGN
art.wzh@msa.hinet.net

L'esprit du terrorisme © Éditions Galilée 2002
Requiem pour les Twin Towers © Jean Baudrillard 2002
Hypothèses sur le terrorisme © Éditions Galilée 2002
La violence du mondial © Éditions Galilée 2002
Le virtuel et l'événementiel © Éditions Galilée 2004
La pornographie de la guerre © Éditions Galilée 2004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Galilée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理論與當代戰爭系列 3

恐怖主義的精靈

L'ESPRIT DU TERRORISME

作者 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策劃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
主編 朱元鴻
譯者 邱德亮、黃宏昭
責任編輯 趙曼如、吳惠貞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79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網址：www.cite.com.tw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 (香港)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35 號 3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 (馬新) 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E-mail: citecite@streamyx.com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6 年 8 月

售價 / 2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13: 978-986-7252-36-4

ISBN-10: 986-7252-36-5

理論與當代戰爭系列

911專輯

1

恐怖主義的精靈

尚·布希亞

L'ESPRIT DU TERRORISME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JEAN BAUDRILLARD

文匯大學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 策劃 朱元鴻 主編·校閱 鄧德亮 黃玄財 譯

目次

主編序

第四次世界大戰及其共謀，見過嗎？ 朱元鴻 7

恐怖主義的精靈 黃宏昭譯 31

雙子星輓歌 黃宏昭譯 57

對恐怖主義的一些假設 黃宏昭譯 67

全球的暴力 黃宏昭譯 91

附錄1

虛擬與事件性 邱德亮譯 105

附錄2

戰爭的色情 黃宏昭譯 133

主編序

第四次世界大戰及其共謀，見過嗎？

The Fourth World War and its Collusion, Have you seen it?

朱元鴻

I.

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車廂發生三起爆炸，同時第四枚炸彈炸穿了一輛雙層巴士，總計造成死亡超過五十人，受傷超過七百人，英國新聞媒體稱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倫敦遭受德軍空襲以來最慘的攻擊。

在此之前，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馬德里中央車站遭受恐怖攻擊，四列火車接連發生十起爆炸，造成一百九十一人死亡，一千八百人受傷。再往前，2003年5月中旬，短短十天內，從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德到摩洛哥卡薩布蘭加接連發生多起恐怖攻擊事件，沙國首都利雅德外國人社區的汽車炸彈連續爆炸，造成九十餘人喪生，近兩百人受傷；摩洛哥首都卡薩布蘭加市中心發生的五起自殺式炸彈攻擊事件，造成四十一人喪生及近百人受傷。11月20日，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英國總領事館和匯豐銀行總部連遭汽車炸彈攻擊，造成二十七人喪生，逾四百五十人受傷。再往前，2002年10月12日，印尼峇里島西方遊客聚集的夜總會遭遇恐怖攻擊，二百零二人罹難，三百多人受傷。此外，在美軍佔領的伊拉克，恐怖攻擊幾乎是每週都

發生的游擊戰形式。除了這些模樣令人驚駭、已經發生而遭受譴責的恐怖事件，還有無數遭到警告、尚未脫胎而出的恐怖攻擊，包括義大利、丹麥、菲律賓、賴比瑞亞、索馬利亞、馬來西亞、肯亞以及中亞的烏茲別克等國，當然，美國本土將永遠守候著下一次的震驚。

回首，2001年9月11日舉世震驚的紐約世貿雙子星恐怖攻擊事件，竟真如布希亞在本書〈恐怖主義的精靈〉開場時的形容：事件之母。而且已經證明是個孕育力無窮、胎連禍結、多產的母體。

倫敦恐怖攻擊迄今已十天了，布希亞對此發表了什麼意見嗎？還沒聽說。但是，出現了許多倫敦事變的評論，早已紛紛引述布希亞在本書裡的詞句：「恐怖主義有如病毒，無所不在，它不需要阿富汗做為基地」、「全球游擊戰……這是布希亞所謂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嗎？」、「不再有前線，沒有疆界，敵人藏匿在這個與它激戰的文化的心臟裡」……

布希亞對9/11的評論成為無盡期守候著每一次恐怖攻擊事件的珠璣集，對一些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荒唐。布希亞〈恐怖主義的精靈〉一文最早於2001年11月2日出現在法國《世界報》

(*Le Monde*)，數週之內引來了一些揶揄撻伐，一篇題為〈法國吐司〉¹的評論，一方面暗示布希亞在訓練有素的哲學家們眼中是個笑料，另一方面卻又無奈的長嘆：如果曾經成為報紙頭版的笑料，都無法推翻或減損他被當做人文知識分子的聲譽，還拿他有啥辦法？

儘管招嫌惹譏，布希亞評論的魅力、廣受引述且令人再思的警語，卻是出自其獨特的形上學脈絡與洞察。2002年1月，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刊出了一篇布希亞專訪，題為：〈這是第四次世界大戰〉，訪談人率直的問，難道你（對9/11與全球化及其抗拒，朝向自我毀滅進程）的分析，不是荒唐丟臉，不顧道德的說法嗎？布希亞回答：「在我自己看來，我是很守道德的，那是一種分析的道德，誠實的責任。換言之，面對真相時閉上眼睛，找尋藉口，為了掩蔽自身難以接受的事，那才叫不道德。我們必須超脫善惡對立來看事情。我試著毫不含糊的與事件正面遭遇，不能這樣做，才是對歷史的道德虛偽。」

¹ Mark Goldblatt, "French Toast: America Wanted Sept. 11," *National Review Online*. December 13, 2001.

II.

9/11是個重大事件嗎？

一般印象：是！

哲學家德希達說：不確定！

布希亞說：是！

9/11恐怖攻擊造成四千多名無辜平民罹難，熔毀了紐約世貿雙塔，美國與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的象徵性地標，這也是1812年以來美國本土首度遭受到的攻擊行為。美國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歐洲強權的殖民時代，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了納粹主義，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就是美國主導的冷戰，以圍堵與嚇阻的手段終結了共產主義。叱吒世界一兩個世紀，美國本土還真不曾受到攻擊，直到9/11，因此，這是個重大事件。

然而這些理由，正好是德希達懷疑的理由。「重大事件」的印象是怎麼來的？印象，已經是一種特定評價的相信——“the impression is informed”。首先，「9/11重大事件」是個美英觀點的語彙，與支配世界舞台的政治論述無法解離，與國際

法、外交機構、媒介，以及科技的、資本的與軍事的力量切分不開。整個資訊機器的優勢體系，包括語言、傳播、修辭、影像、媒介等等，為9/11賦予了「重大事件」的內容。造成四千多名無辜受害者喪生是「重大」事件的標準嗎？可是歷史上，許多時候，許多地方，對無辜人民規模更甚於此的集體謀殺，卻不曾被記錄、被詮釋、被感覺或被呈現為「重大事件」，他們不僅沒能給予不可忘懷的災難印象，甚至沒能夠以歷史「事實」的認知保存下來（德希達沒有點出，英美兩個相繼的帝國主義其實更經常是加害者，傷膝澗 [Wounded Knee] 屠殺印地安村莊，美萊 [My Lai] 屠殺越南村莊，不都是婦孺不饒？入侵伊拉克後造成無辜平民罹難人數早已超過9/11的三倍）。再說，美國本土遭受攻擊？可是，誰能確認美國的疆域界線在哪兒？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疆域不都由「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s）來界定？而以「美國利益」為由進行政治與軍事介入的範圍，於今遍及世界。美國公民、美國盟邦，誰能確認這條「美國利益」的界線止於何處²？

² 記得不久前布希以牛仔的豪邁姿態，對台灣海峽的局勢表示，若有事，“We'll be there!” 有不少人多麼希望確認台灣與曼哈頓一樣，屬於「美國利益」！

德希達質疑「9/11 重大事件」的說法，因為他試圖切斷優勢論述對於9/11 事件意義的霸佔。像個哲學家，他指出「事件」的弔詭性：既開啟經驗又抗拒經驗的佔有。事件，召喚我們在某種命名、知識與預期的視域上去進行理解、識別、標定與描述；然而真正值得被稱為「事件」的，是某種降臨而令我們驚異的事，是終究無可言喻（無法全然理解的），未被決定的也不可能被決定的。我們用9/11 這個空洞的日期數字來稱呼它，不全然因為簡便，也因為它難以言喻：某個恐怖的事在9/11 發生了，而我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³！

布希亞毫不猶豫的聲稱9/11 是個重大事件。他可以全然同意哲學家所謂「事件」的弔詭性：難以言喻的，無法全然理解的，未被決定的也不可能被決定的。然而正是因為這些特性，真正的事件，已經與恐怖主義、邪惡精靈（evil genie）具有形上學的同構地位。世界秩序試圖以安全體系來驅除任何意外而不可預測的擾亂。在體系理性的框架內，任何難以管治的形

³ “A Dialogue with Jacques Derrida,” edited in Giovanna Borradori (2003),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85-94.

式、任何不可捉摸的獨特性都是實際上的恐怖。此所以自然災害，或是像車諾比那樣的大規模科技事故，都帶有恐怖的特性，任何空難事故都疑似恐怖行動的結果。任何「不合常理的事件」，特色就是將進入一個文化的「歸咎體系」⁴，在實際上不能理解的狀態下找尋歸罪對象並建構道德譴責，如果歸咎制裁的作為又進一步招致反身性的災難（我們常用「反撲」形容），那麼這個對象（客體）已然具有恐怖精靈的性質。

這是布希亞所謂「客體反諷」（objective irony）的形上學分析樣態之一。先從簡單的例子開始：當男性的思考邏輯與道德原則成為全面支配的文化霸權時，女人的行徑經常被認為是不可理喻、難以捉摸、妖妄奸婪、令（男）人疑懼；青少年，相對於成人的思考邏輯與道德原則的全面支配霸權，也總是顯得同樣的不可理喻，搞怪難懂，有欠教訓。若此刻再依據男性或成人的理性與道德邏輯——因為不懂其他邏輯——進行制裁或壓制，後果可能是更為難堪（卻還是不可理解）的災難性事件。

⁴ 文化人類學家所謂的“blaming system,” 見 Mary Douglas (1992), *Risk and Blame*, New York: Routledge.

9/11 與其後的反恐戰爭，重燃了布希亞早先思考範疇的相干性，於是他展開了一系列相當挑釁的近作。資本主義全球化與西方文化的體系，在勝利進展勢不可遏的同時，召喚出了一個同樣是全球的恐怖精靈，任何時刻任何場所的潛在恐怖攻擊。西方主導科技、市場、觀光和資訊的全球化，以普遍價值壟斷人權、自由、文化和民主的定義權，強行同化其他的文化，消滅他們的獨特性與異質性。恐怖主義是全球化無限擴張的同化暴力所召喚出的「反抗形式」而在西方社會居住、工作、受教育的恐怖分子，襲取了強權支配者的武器，包括運用飛機、電腦網路與媒體來製造恐怖景觀。

不僅如此，客體反諷還可能進入更模稜的樣態：誘惑／挑戰的共謀。

III.

他們幹的，是我們所想要的！

這句話惹毛了很多人。〈法國吐司〉這篇評論就故意扭曲地用了個譏刺的副標題來撩撥人們對布希亞的嫌惡：美國想望

9/11！

冷靜來看，9/11的發生當然令人震驚意外，一個超級強權象徵性的心臟受到攻擊，似乎難以想像，然而卻可能是許多人都曾經預想過的。一個宰制世界的霸權哪天遭受挑戰甚至崩潰，其實是個平凡的想法。記得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小學老師就曾經斷言：「等著瞧，美國的霸權了不起再張揚五十年！」我認為那就是一種(想望)。布希亞聽起來很不道德的說法並非表述一種針對美國的妒恨，而是個有關宰制權力的平凡命題：任何宰制的權力都招致它遭受挑戰甚至崩潰的想法。如果今天宰制世界的霸權換做中國，或者換做伊斯蘭，那麼他們如何遭受挑戰乃至崩潰，也會成為許多人的想望。

他們幹的，是我們所想望的！換個方向，另個層次的命題：宰制的權力想要藉著自身受害的意外事件，來延伸、擴張、鞏固，乃至苟延續命。美國藉著9/11事件發動反恐戰爭，將其軍事武力擴張到阿富汗與波灣。不僅如此，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其近作《例外狀態》就是以布希政權藉著9/11事件啟動國內反恐的「愛國法案」，並擴張對公民與非公民監視、檢查、拘留的行政裁量做為一個最晚近的

例子，來說明現代史中在許多西方政權，包括民主國家，已經成為統治權力的一種典範：利用「例外狀態」來擴張行政裁量，削弱國會，最終顛覆民主制衡而轉形為極權國家。納粹只是個最熟悉的例子⁵。剛上台的希特勒及納粹少數政府利用「國會縱火案」，打擊瓦解了政治反對派，通過了強化法西斯政權的各項法令，逐漸取得全面的極權統治地位。然而此處的命題一點兒也不需要「栽贓」的陰謀論。他們幹的！用不著揣測有沒有自導自演的陰謀劇本，重點是要有個他們：恐怖分子，造成事件來啟動「例外狀態」。「2/27國會縱火案」有個名叫盧貝的荷蘭青年（口袋裡搜出德共黨證）；「3/19槍擊案」有個陳屍魚塢的陳義雄（全民開講錄影帶裡搜出批評政府言論）；9/11有個名叫蓋達的恐怖組織（激怒全美國的賓拉登錄影帶）。然而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終究不是這些面目模糊的恐怖分子，而是事件所啟動的權力生死大戲局。

這個命題不是單向的，還有個主客易位的鏡象。對於恐怖組織來說，他們的權力也需要反恐的回應，而且最好是超乎比

⁵ Giorgio Agamben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例的過度回應。布希政權9/11之後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遂行過度的單邊軍事主義，不僅蒸發掉了9/11之後全世界對美國的同情，疏離了歐洲一些老盟友，也製造了更多的新敵人，「反恐戰爭」成了爬不出的泥淖，成了一個新的時代標籤。若沒有「反恐」的過度回應，激進組織在伊斯蘭世界未必具有能夠擴張的影響力。反恐的軍事主義，在伊斯蘭世界為他們免費送上仇美排英燒不完的柴堆火種。於是在蓋達組織來看布希—布萊爾政權，也是：他們幹的，是我們所想要的！這種敵對共謀的邏輯並不少見，例如毛澤東在八年抗戰期間講的：「日本皇軍是紅軍最好的盟友」，因為日軍在華北過度殘酷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使得所到之處，流離的農民就加入快速壯大的紅軍。又例如過去十年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兩岸敵對意識最強的鷹派，彼此過度挑釁的舉措，成為共謀增進權力的情挑，那廂試射飛彈的挑釁，是這廂想望選票的慶賀焰火，這廂公投制憲的賣力挑釁，則是換取那廂選前回報威脅姿態的祈禱。

二十多年前，布希亞在《誘惑》一書指出，誘惑與挑戰的策略正好對反於溝通的策略⁶。恐怖分子與權力當局之間相互

拒絕溝通協商，兩岸政府之間也拒絕溝通迴避協商。然而正是在不溝通不談判不妥協的情況下，挑釁／誘惑的兩方得以共享著相互增進權力而且繼續升級的共謀祕密。像史密特（Carl Schmitt）那樣將劃分敵／友的決斷當做界定政治概念之基礎的理論⁷，至少還需要補足領悟敵／友概念本身模稜性的理論，否則不免顯得天真單調。畢竟歷史上、政治現實上，敵對共謀相互增進權力，與盟友之間的欺矇／剝削／背棄／出賣，同樣地尋常。

儘管共享相互增進權力的共謀祕密，仍然是個致命的對決關係。

恐怖分子想要的是過度反應。受到攻擊的權力當局很清楚這一點，因此總是（倫敦爆炸事件後英國首相布萊爾又這麼講話）呼籲民眾不要恐慌，要照常工作生活。然而，合法壟斷暴力手段的權力當局，卻總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發動壟斷的過度反應。反恐戰爭的軍事行動，愛國法案的祕密監控、檢查與拘

⁶ Jean Baudrillard (1990), *Seduction*, London: McMillan.

⁷ Carl Schmitt (1996),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留，日子不會再照常。許多人，包括哲學家德希達，帶著道德譴責的語調說：在宗教狂熱的目的下以最壞的方式利用資本主義科技的現代性，這樣不顧人命蔑視法律的殘酷行動，沒有未來⁸。當然，縱令有9/11那般壯觀的規模，我們也不會設想任何組織能夠以這種自殺炸彈的方式征服世界。然而，恐怖精靈的未來在於全球體系自身過度反應的無限升級，體系自身不可預測的失穩、失序與混亂。這是誘發自體免疫疾病（autoimmunity）的致命策略。像SARS，病患最終並非死於病毒，而是死於劇烈的免疫反應。SARS病患在感染後形成免疫反應，但是後來的發展卻失去控制，患者體內免疫系統高度緊張，釋放了細胞因子、腫瘤壞死因子等物質，不僅殺死了被病毒感染的細胞，也攻擊周圍的組織，免疫系統產生的抗體和T、B淋巴細胞在與SARS病毒激烈作戰的過程中形成的免疫風暴，對

⁸ “A Dialogue with Jacques Derrida,” 同注3，頁113，“*open onto no future and, in my view, have no future*”（原文斜體強調）。德希達在批評恐怖主義「沒有未來」的同時，也用「自體免疫疾病」（autoimmunity）的危險來批評美英當局過度回應的不智（見下文）。這樣兩頭批評雖然平衡了哲學家的立場，但卻錯過了布希亞在「客體反諷」、「誘惑—挑戰—對決關係」、「致命策略」等識框之下看到的對局腳本：恐怖主義確實沒有別的未來，只有在誘發體系過度反制造成「自體免疫疾病」的爆發。

正常器官組織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導致病患死亡。

可以這麼說，恐怖分子的自殺攻擊，只是最初的感染，自體免疫疾病因過度反應而致死，則形同體系的準自殺。恐怖主義的邏輯暗含了以個體自殺換取霸權體系自殺的象徵性對決關係。這邏輯我們該不陌生，如果還記得滿清帝國是怎麼被推翻的。搞刺殺的秋瑾、徐錫麟，十一次舉事的革命黨人，想的當然不是以堂堂之師、正正之旗來與帝國對陣。然而滿清政府每一次的鎮壓，都加速惡化了其自身的情勢，終至一夕崩潰。咱們的先烈，咱們的國父，滿清的大寇，就像SARS，都是恐怖精靈！

IV.

在數位時代，影像不再僅是再現或資訊，而與戰爭完全整合。駕馭馴化的媒體，餵食聯營合用影像的記者，向後方民眾以及世界遞送美英聯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軍事行動的形象：科技高超避免無辜傷亡的「乾淨戰爭」、推翻神權與獨裁壓迫的「解放戰爭」。呼應9/11無辜受害的永恆影像，是軍事科技與道德目標都令人驕傲的戰爭神話影像。

然而，俗話說，愛玩什麼的就死於什麼。愛玩影像奇觀的，也必遭到影像奇觀的反撲反噬。2004年5月，阿布格萊卜（Abu Ghraib）美軍虐待的影像醜聞爆發，陸續出現千餘張虐待照片，撕毀了「乾淨」、「解放」的戰爭神話。在這個數位時代，阿布格萊卜地牢裡的影像，永遠不會消失，萬聖節的黑／橘主色調⁹，映照著紐約世貿雙塔天際的藍色調，轉變了人們對9/11的情感結構。阿布格萊卜、關達那摩（Guantanamo），代表著在阿富汗、伊拉克、美國離島仍然囚禁數千人的許多囚牢與拘留營，成為躍上歷史場景的名詞。我預測，其撕毀西方人道、人權、民主、自由等神話的象徵性潛力，將持續召喚並醞釀出一個不小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對反文化。

阿布格萊卜，原是個獨裁者海珊刑虐政治反對者的地牢，在美英聯軍接手之後，大兵們竟繼續地牢刑虐的角色，還帶進個人數位相機的新科技，以及西方鄙賤的色情猥褻，將刑虐當做娛樂。照片裡，大兵在街上遛著用狗鏈拴著全裸爬行的伊拉克囚俘，牽著軍犬威脅在牆角跪地瑟縮的囚俘，而今惡名昭彰

⁹ 囚衣是橘色的，被迫套上的尖高頭罩是黑色的。

的女憲兵Lyndee England¹⁰用手比成手槍瞄準一排全裸男性囚俘的生殖器，全裸的囚俘被迫疊成人肉堆，被套上女用內褲，或是被戴上黑色3K黨模樣的尖高頭罩，雙臂十字張開雙手連接電線，照片裡旁觀的大兵不分男女，帶著惡意滿足的謔笑。當這批醜聞照片爆發流傳之後，布希亞幾乎立即在法國《解放報》上發表了一篇〈戰爭的色情〉。他將這些照片與9/11影像相比，9/11是個令人驚異的非凡事件，而虐俘影像，他認為：殘暴、卑鄙下流，然而卻平凡陳腐，沒啥稀奇。比起其他一些評論，例如蘇珊·桑塔（Susan Sontag）與西摩·赫許（Seymour Hersh）¹¹語調裡的震驚與憤怒，布希亞的語調是有啥可驚怪的無聊感。

震驚憤怒嗎？美國領導人也公開對這些照片表達震驚與嫌惡，好像那些影像是個引起公關危機的惱人弊案。就算進一步

¹⁰ 這當然是性別歧視。Lyndee England如今已成為許多諷刺漫畫的主題：女生也可以幹這種事！

¹¹ Susan Sontag, "What Have We done?" *The Guardian*, May 24, 2004; Seymour Hersh (2004), *Chain of Command: The Road from 9/11 to Abu Ghraib*,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對影像後面發生的事表示遺憾，也好像那些事只發生在阿布格萊卜，只是「幾顆壞蘋果」，不能代表全體美英聯軍。布希（2004年5月6日）對受辱的伊拉克俘虜及其家屬表示抱歉，但也表示遺憾人們只看這些照片而不理解美國心（以自由民主解放中東的計畫？不是真的推翻了一位暴君麼！），這樣「不公平」！

布希亞感到這些影像下流卻無聊。沒什麼好為這些影像大驚小怪。阿布格萊卜的影像既不是弊案的曝光，也不是幾顆壞蘋果的醜事，而是整個侵伊戰爭暴力的諧謔：美英聯軍羞辱手無寸鐵無力反擊的伊拉克人，那是戰爭本身的色情面目。

早些年前，布希亞有個頗知名的說法：迪士尼樂園是真實的美國。

有那麼一座迪士尼樂園在那兒，就為了遮蔽其實整個真實的美國就是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被呈現為想像的世界，好讓我們相信其他地方是真的，而其實整個洛杉磯，整個環繞它的美國都不再是真實的，而屬於超真實的和擬像的層次。……迪士尼樂園的想像世界既不真也不假，它

是個延阻裝置，靠著反轉真實的虛構來返老還童，此所以這個想像樂園裡的幼稚退化。那是刻意用來當做一個幼稚世界，好讓我們相信成人們都在別處的真實世界裡，好遮蔽其實真正的幼稚無所不在。

同樣的邏輯，阿布格萊卜地牢就是真實的伊拉克戰爭。有個阿布格萊卜虐俘醜聞，讓人們相信真有見不得人的弊案，真有令人痛心的壞蘋果，讓人們相信其他地方的美英大兵是好樣的，相信聯軍在伊拉克的解放行動是乾淨崇高的，而遮蔽了其實對無力抵抗的伊拉克人殘暴地羞辱，無處不在。阿布格萊卜虐俘，就是這場侵略伊拉克戰爭的真面目。

那張虐俘照片，將囚俘套上3K黨模樣的高尖黑色頭罩與罩袍，雙臂張開成十字架受難狀，雙手接上電線，擺佈成遭受3K黨私刑的姿勢。這詭異的圖像給予3K黨徒（別忘了種族歧視的意涵）遭受自己人私刑的暗示。布希亞形容：這是一個對自己的霸權不知所措的美國，對自己施行了電刑。布希亞評論一年後的今日，這幅圖像已經成為全球蔓延的恐怖精靈¹²，在諷刺漫畫、行動劇、Abu Ghraib R Us藝術工作室，不斷地改

編複製，而且像蜘蛛人或超人一樣，有了流傳歷史的名字：阿布格萊卜人（Abu Ghraib Man）。

V

布希亞早先曾經形容自己是個理論的恐怖分子，用的不是武器而是理論暴力¹³。他也曾表示，理論不能順從真實，而必須與真實相互挑戰。理論必須讓自己成為他所描述的世界裡的一個事件，參與並加速它的邏輯¹⁴。

當布希亞對晚近恐怖主義的分析頗具影響力的時候，許多人用他自己形容的「理論恐怖分子」立場來質疑他。例如

¹² 一位21歲波士頓學院學生，以Abu Ghraib Man裝扮站在一間美國志願軍招募中心前，他立即遭到警察逮捕，並被控以妨害安寧以及因製作惡作劇用的偽炸彈而被控重罪。逮捕他的警察和起訴他的檢察官未必認識他諷刺劇顛覆性的政治意涵，卻誤以為他是恐怖分子。照片可參見<http://www.politics1.com/news/Abu-Ghraib.jpg>

¹³ Jean Baudrillard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lated by S.F. Glas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¹⁴ Jean Baudrillard (1988),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Brooklyn, N.Y.: Semiotext (e), pp. 97-101.

Alain Minc用布希亞〈恐怖主義的精靈〉(The Spirit of Terrorism)的倒裝標題發表了一篇評論〈精神上的恐怖主義〉(Terrorism of the Spirit)¹⁵，很爛的評論，但提出了一項相當普遍的指控：布希亞自己認為他僅從事精神上的恐怖主義，然而這不能當做迴避其言論惡化當前局勢的託詞，亦即其言論具有「惡意反美」以及「正當化恐怖主義」的效果。對這類指控，布希亞回答：我沒有讚頌任何事，沒有指控任何人，不為任何事辯護，不要錯把信差當信息。我所做的是分析全球化無限制擴張的過程裡如何創生了摧毀它自己的條件¹⁶。

我們也不急著為誰讚頌、指控或辯護。看來布希亞所謂的第四次世界大戰還正在暖場，或許恐怖攻擊將逐漸與德機轟炸倫敦一樣尋常，或許哪天激變出（西方？）社會內部的對反文化運動。只要運氣還好，不碰上什麼凶惡事件的爆央地，或是因國家安全被送入拘留營，我們還有的是時間等著瞧。

¹⁵ *Le Monde*, November 6, 2001. Translated by David Jacobson, *Corresponde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ulture & Society*, No.9 Spring 2002.

¹⁶ Jean Baudrillard (January 2004), "This is the Fourth World War: The *Der Spiegel* Int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udrillard Studies*, vol. 1 no. 1.

恐怖主義的精靈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恐怖主義的精靈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黃宏昭譯

一提起世界性的事件，我們知道的不少。從黛安娜王妃之死到世界盃足球賽。還有暴力的、真實的事件，則從戰爭直到種族屠殺。然而，一提起世界級的象徵事件——亦即，不只獲得世界性的報導，同時還能呈現全球化自身挫敗的事件——的確沒有發生過。整個不景氣的九〇年代，事件都「罷工」了（如同阿根廷作家馬賽多尼奧·費南德茲 [Macedonio Fernandez] 所說的）。好了，罷工現在結束。事件不再罷工了。在紐約世貿中心遭攻擊事件之後，可以說我們面臨著一種絕對事件（absolute event），它是所有事件之母，一種將所有前所未發生的事件聚集在內部的純事件（pure event）。

整個歷史和權力的演出也遭那事件干擾，就連分析的條件也不例外。你必須慢慢來。當事件停滯不前時，你要先期預測，動作比它們還快。當事件加速到一個程度時，你必須放慢些——切莫讓自己埋葬在一堆雜七雜八的文字或密佈的戰雲中，而對這令人難忘的白熱化影像，要原封不動的停格在它原初的景象。

所有那些言談和論述，都是一種對事件和事件所激發出的幻想強烈宣洩的證詞。道德譴責和神聖反恐聯盟規模之龐大，

就像目睹全球超級強權遭摧毀，或就某個意義而言較好的說法是，目睹超級強權正在自我摧毀，在火光閃閃中自我了結，而令人歡欣鼓舞一般。因為正是那個超級強權，透過其令人無法忍受的力量，挑起這種已成為世界各地地方病的暴力；也（不知不覺的）挑起了盤踞在我們心頭的恐怖主義的想像。

我們都曾經夢想過這一事件，每一個人毫無例外的都夢想過這樣的事——因為沒有人可以避免預想看見任何達到如此霸權程度的強權的瓦解——這樣的夢想是西方道德意識所無法接受的。然而，這是事實，那些想要極力排拒它的言談和論述，其情緒的暴力正好測度出了這是個事實。

甚至必要時，我們可以這麼說：他們之**所為**，正是我們之**所欲**。假如這一點不納入考慮，此一事件就喪失任何象徵性層次，成為一件純粹的事故，一次純然任意的行動，一些狂熱分子嗜殺的幻想，而剩下來該做的事就是消滅它們。不過我們清楚知道，事情並非如此。這說明了所有關於驅除邪惡的對反恐懼症的（counterphobic）胡言亂語：因為，邪惡它存在，四處都有，彷彿慾望的朦朧客體。如果沒有這種根深柢固的共謀，事件將不會有影響力。同時，恐怖分子無疑也知道，在他們的

象徵策略中，是可以憑藉這種莫可明言的共謀。

這種事件已遠超出那些被剝奪者、被剝削者，和那些最後站在全球秩序錯誤一方者，其對支配性世界強權的憎恨。甚至那些在此一秩序之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心中也存著這種惡意。對任何決定性秩序、決定性權力的敏感是相當普遍的。世貿中心的雙子星大樓，正是這種決定性秩序完美的體現，體現在完美的雙生性或成對性（twinness）中。

不需要死亡驅力和毀滅的本能，或甚至不是因為反常的、意外的效果所致。非常合理，也非常無情，權力力量的增加，即升高了想要摧毀它的意志。它參與了自己的毀滅。當這兩座塔樓倒塌時，人們有印象的是，雙塔以自身的毀滅回應自殺飛機的自殺行動。有句話說：即便上帝，也無法向自己宣戰。然而，上帝可以。西方，正以上帝之姿（神授的主宰者，絕對的道德合法性），開始自我毀滅，並向自己宣戰。

無數災難片都見證此一想像，這些影片明顯的企圖利用影像驅魔逐惡，透過特效掩蓋事情真相。但，影片所散發出普遍的吸引力，顯示演出與真實相去不遠，如同色情片一樣。而當體系接近完美和無所不能時，拒斥體系的力量也變得越強。

或許恐怖分子（專家也一樣）也沒料到雙子星大廈會傾毀。它的傾毀——遠超過對五角大廈的攻擊——具有無比影響的象徵作用。整個體系的崩塌是藉由不可預期的共謀所產生，就像這兩座塔樓，透過自身的坍塌，透過自殺，參與了這一事件的完成。就某種意義而言，整個體系，因其內部的脆弱，給了最初行動一臂之力。

體系越是致力於全球擴張，最終在形成單極（single）網絡，它就越容易在單一點上遭到傷害（單一個小小的菲律賓駭客，從他手提電腦的內部深處，發動「我愛你」病毒，就破壞了全球網路系統）。在這次事件中，十八位自殺攻擊者，得利於死亡這一絕對武器，以及科技效能的提升，開啟了全球災難的進程。

當全球力量極度壟斷局勢，當科技機構的所有功能遭到可怕的凝聚，當另一種思考形式不再可能時，除了透過恐怖主義情勢的移轉（terroristic situational transfer）手段外，還有什麼方法可行？是體系自身為這種殘酷的報復行動製造出客觀的條件。手中抓住所有的牌，迫使他者改變了遊戲規則。新的遊戲規則相當殘暴，因為賭注相當慘烈。體系力量過度龐大，擺出

一副難以解決的挑戰，恐怖主義則也以一種不容許交換的決定性行動回應。恐怖主義的行動就是要將不可化約的獨特性，恢復到普遍交換體系的核心。所有在單極權力為建立支配性全球網絡而招致死亡的獨特性（singularity）（物種、個體和文化），如今天正透過恐怖主義情勢的移轉，展開他們的報復行動。

這就是以恐怖對抗恐怖，背後不再有任何意識形態。我們如今已遠離意識形態和政治。不是意識形態，沒有理念，甚至不是伊斯蘭的理念，足以用來說明這種煽動恐怖主義的能量。其目的甚至不再是改變世界，而是（就像過去異端所做的）透過犧牲讓世界更激進。反之，體系的目的則是透過力量去實現它。

恐怖主義就像病毒，無所不在。恐怖主義遍佈全球，它伴隨支配體系而來，如同支配體系的陰影，也像是一個雙面間諜，準備在任何地方展開行動。我們不再能區別兩者，恐怖主義正寄身於這種攻擊它的文化核心中，以及讓全球被剝削者和未開發國家跟西方世界形成對抗的可見裂痕（和憎恨）核心中，這種裂痕則祕密的跟支配體系內部的裂痕相連結。體系可以壓制任何可見的對立，但對付另一類，也就是結構中的病毒——這

就好像任何支配機構藏匿著對抗機置（counterapparatus），隱匿一個讓人看不見的機制——亦即，去對抗一種幾乎可以自動逆轉其自身力量的形式時，體系根本就無能為力。恐怖主義就是這種沉默逆轉的震波。

然而，這並不是文明或宗教的衝突，它所涉及的也遠超過伊斯蘭和美國的問題，使勁的將焦點放在這種衝突上，只是為了製造出一種可見的對立以及可以藉由武力解決問題的錯覺。這兒的確存在著一種根本的對抗，卻超乎了美國幽靈（spectre）（或許是全球化的震央，卻不是全球化的獨一化身），和伊斯蘭幽靈（spectre）（也不是恐怖主義的化身），而指向那個**全面勝利的全球化**卻正在跟自己戰鬥。就此而言，我們確實可以說這是一場世界大戰，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是第四次，一場唯一、真實的全球性戰爭，正是以全球化自身做為這場戰爭的賭注。前兩次大戰符合經典的戰爭形象。第一次大戰結束了歐洲的強權和殖民時代，第二次則終結了納粹主義。第三次，確實曾經發生，以冷戰和嚇阻（deterrence）的形式，終結了共產主義。從一場戰爭到另一場戰爭，每次都朝單極的世界秩序（single world order）更進一步。今天，已確實攀登高峰的這個

單極秩序，在每一次動亂中，都發現它自身正跟散佈在全球核心地區的反抗力量搏鬥。這是一場所有細胞、所有獨特性，以抗體形式進行造反的碎形戰爭（fractal war）。這也是一場無法準確說明的對抗，因為戰爭的觀念必須不時的從像波灣戰爭、阿富汗戰爭這種奇觀式的精采片段中解脫出來。但第四次世界大戰則在他方。那就是對每一個世界秩序和任何霸權支配糾纏作祟的東西，假如伊斯蘭支配這個世界，恐怖主義將起而對抗伊斯蘭。因此，是這個世界，是全球本身在對抗全球化。

恐怖主義是不道德的。世貿中心事件，這起象徵性的挑戰，是不道德的，同時也是對本身就不道德的全球化的一個回應。所以，就當我們是不道德的吧；如果，我們想要對這些事有某程度的了解，讓我們稍稍跳出「善」與「惡」，去看一下。當我們總算碰到一次，不只是挑戰道德，同時也挑戰任何解釋形式的事件時，就讓我們試著帶著邪惡的理解來探討這事吧。

真正的關鍵點在於，我們對西方哲學，對啟蒙以及善惡之間關係的全然誤解。我們天真的相信善的進程，以及它在所有領域（科學、技術、民主、人權）的進步，都對應出邪惡的挫

敗。似乎沒有人理解到善與惡是一起演進的，是同一動作的部分。一方的勝利不是對另一方的抹除，一點也不會。以形上學言之，邪惡被視為是偶然的不幸，但這項所有摩尼教（Manichaeism）善惡二元對立形式從而衍生的公理，根本就是幻覺。善沒有擊垮惡，反之，惡擊垮善，也確實未見發生：兩者既不可征服任一方，同時又彼此牽絆，互為關連。最後，善要能挫敗惡，只有自此不再做為善，藉著自身的掌握全球壟斷力量，透過這樣的行動，引發出相應的暴力反擊。

在傳統世界裡，依循著一種維持道德世界的緊張和均衡的辯證關係，善與惡之間的平衡仍存在。無論如何，跟兩大強權在冷戰時期維持恐怖平衡的對抗方式沒什麼兩樣。不存在著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優勢。一旦論斷善的全面存在（肯定性的霸權超過任何否定的形式，並排除死亡，以及任何潛在的敵對力量——就是這種善的價值的全面勝利），均衡關係立即遭推翻。從這點來看，均衡已不存在，同時邪惡就好像重獲無形的自主力量，自此，呈級數般的成長。

相對而言，這現象已經或多或少在政治層次上發生，也就是共產主義的消蝕和自由主義勢力的全球性勝利：正是在這點

上，出現了一個鬼魅般的敵人，無孔不入的出沒於整個地球，也像病毒一般在各處移動，從所有的權力空隙中湧出：它就是伊斯蘭。然而，伊斯蘭只是沿著這種對立而形成的變幻前線（moving front）。敵對無所不在，同時也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所以，這是以恐怖對抗恐怖。但，這種恐怖並不對稱。這種不對稱的恐怖使得全球的主宰力量完全繳了械。全球主宰力量跟自身對立，使得它只能進一步投入自身的力量關係邏輯中，卻不能在象徵性挑戰和死亡的領域中操作，他們不再知道這種操作，因為，它已從自己的文化中抹除。

到目前為止，這種整合的力量廣泛成功的吸納和解決任何危機，任何的負面性，它也創造出徹底絕望的情境（不僅對失去權利者如此，對那些生活相當舒適的富貴者和特權者，也不例外）。目前最根本的改變在於，恐怖主義已不再進行沒有任何報酬的自殺行動，他們讓自身的死亡發揮有效且具攻擊性的態式。透過一種策略上的直覺，看穿，也就是理解到對手無比的脆弱——對於已臻準完美境地（quasi-perfection）的體系，因為特定的表徵，即可遭星火燎原的一種理解。他們已成功的將自身的死亡轉化成絕對的武器來對抗一個體系，一個在排除

死亡基礎上操作，以及以零死亡（zero-deaths）為理想的體系。每一個零死亡的體系都是一種零和對局（zero-sum-game）的體系。且所有的嚇阻和摧毀手段，根本毫無能力對抗一個早已將死亡轉成反擊武器的敵人。「對美國的轟炸算得了什麼。我們一心求死，就像美國人一意求生。」因此，四千人死亡的不對等代價，對零死亡體系造成了打擊。

在此，全都跟死亡有關，不僅是關於即時（real time）的——可以說現場立即的——大量死亡的湧現，同時也是一種遠超過真實的死亡的湧現：死亡是象徵和獻祭的，也就是說，這是絕對、不可撤回的事件。

這就是恐怖主義的精靈（the spirit of terrorism）。

絕對不透過武力關係攻擊體系。這是體系本身強加給你的（革命）想像。體系之能存活，只有透過不斷的將這些對它的攻擊，牽引進入一種以真實為基礎的，也就是屬於它自己的戰鬥上。然而，一旦將鬥爭移入象徵領域，這裡的規則是挑戰、逆轉和競價。所以死亡僅能夠透過相等或更大的死亡來償還。藉著體系無法回禮來挑戰體系，除非體系以自身的死亡和坍塌來回禮。

恐怖主義的假設就是，體系本身將以自我毀滅來回應死亡和自殺所引起的多重挑戰。因為，體系和權力兩者都具象徵性義務，而在這個陷阱裡，災難般的坍塌才成為它們僅有的機會。在這個死亡不可能交換的渦漩循環裡，恐怖分子的死亡像是極微小的點，但他們卻創造出一個巨大的吸力或是空無，一種強大的對流。環繞著這微小的點，整個真實的體系和權力的體系聚集起來，又遭刺穿，再短暫的集結，然後，在自身的過度效率中滅亡。

恐怖主義的戰術模式就是造成真實的過度化，同時使得體系在過度真實下坍塌。這種狀況，連同體系所動員的暴力，最可笑的特質就是轉過身來反對體系，因為恐怖分子的行動既是體系自身暴力的過度鏡映，同時也是體系所禁止的象徵性暴力模型，體系所無法運作的只有象徵暴力，也就是它自身死亡的象徵暴力。

這就是為什麼整個可見的力量，在對抗這種微小、但具象徵性的少數個體的死亡上無能為力的原因。

我們必須面對一些事實，同時得接受新的恐怖主義已誕生，一種大玩遊戲、控制遊戲規則、以瓦解體系為唯一目的的新

的行動形式。這些恐怖分子不僅玩得不公平，因為他們拿自身的死亡去玩——而這是沒有人可回應的（他們都是膽小鬼）——同時也掌控了所有具支配力量的武器。金錢、股市炒作、電腦科技和飛航技術、奇觀和媒體網絡。他們吸納現代性和全球化的每一物事，並不改其目標的去摧毀這種力量。

恐怖分子甚至，也很狡猾的利用美國人平凡的日常生活，做為掩飾和偽裝。住在郊區，陪家人閱讀和學習，直到突然像顆定時炸彈那般的啟動他們自己。這種完美無瑕的隱匿式操作能力，幾乎就像9/11的奇觀異景那般恐怖。因為，它讓任何人和每個人都疑神疑鬼。任何一個無惡意的人，難道不可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嗎？假如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出入，不被察覺，那麼我們之中的任何人都是現行未被察覺的罪犯（每架飛機也都成為嫌疑的對象），最後，這些無疑是真的。這很有可能呼應了一種潛在、隱密、小心謹慎的壓抑犯罪性的無意識形式。犯罪性總是能夠，如果不能浮現的話，至少能對邪惡的景觀偷偷的感到悸動。所以事件蔓延到最小的細節上——這是一種更加微妙的精神恐怖主義的來源。

根本的差別在於，恐怖主義除了利用體系所擁有的武器

外，還進一步擁有一項致命武器：就是他們自己的死亡。如果他們只滿意於運用體系所有的武器來對抗體系的話，那麼，他們將立即被消滅。假使他們只使用自己的死亡去對抗體系，就會像是無謂的犧牲，也將很快消失。至目前為止，恐怖主義幾乎總是如此（巴勒斯坦的自殺式攻擊就是一例），這就是他們過去注定失敗的原因。

一旦他們將所有對他們有利的現代資源，與高度象徵性的武器結合時，所有事情都改變了。摧毀性的潛能無限的增長。正是這兩種要素的倍乘（對我們而言似乎是難以協調的要素），使得他們具有如此的優勢。相反的，零死亡的戰略，一種乾淨科技戰的戰略，根本就趕不上象徵力量對真實力量的改變。

這一攻擊的空前成功，暴露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獲致某些理解的話，就必須拋棄西方觀點，去看看恐怖組織在幹些什麼，以及他們正在想些什麼。對我們而言，如此的效能隱含了高度的理性和算計，這是我們在其他地方所難以想像的。然而，即便這一事件，也像任何理性組織或特務機構一樣，總難免有所疏失和遺漏。

因此，如此成功的祕密必須另尋解釋。其差別在於，我們處理的不是僱用合約（contract），而是誓約（pact）和犧牲的義務。這種義務不會背叛或腐敗。更神奇的是，它們適應全球網絡和技術規則，又不失任何赴死的共謀。不像合約，誓約並沒有綁住個人——甚至他們的自殺也不是個人英雄主義。這是一種受理念要求而封印的集體獻祭行動。它結合了兩種機制——操作性的結構和象徵性的誓約——使得這麼一種極端的行動成為可能。

我們不再了解什麼是象徵性的算計，像是玩撲克牌或誇富宴：以最少賭注，獲致最大成果。而真正最大成果就是恐怖分子在曼哈頓攻擊中所得到的，這也正是渾沌理論一個很好的說明：初始的撞擊導致無法計算的後果；反之，美國大規模的軍事部署（沙漠風暴），得到的卻是一個可笑的後果——也就是颶風最終在蝴蝶翅膀拍擊下了結。

自殺式的恐怖主義是窮人的恐怖主義。然而，這卻是一個富人的恐怖主義。這才更讓我們感到驚駭：這一事實是，他們既已成為富人（擁有所有該有的資源），卻沒有停止過要摧毀我們。無可否認，以我們的價值體系而言，他們正在詐騙。這

是一場不公平的遊戲，他們將自身的死亡投入這場競賽中。但，這並不造成他們的困擾，而且這一新的遊戲規則，並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

任何的論調都用來詆毀他們的行動。例如，稱他們是「自殺的」和「殉道者」——而且還立即補上，說殉道沒有意義，它跟真理無關，甚至（引用尼采）它還是真理的頭號敵人。無可否認，他們的死亡證明不了什麼，但在一個真理本身就已捉摸不到（或是我們宣稱擁有了它？）的體系裡，沒有什麼是可以證明的。此外，這種高度的道德論調也可以轉換個角度來看。如果自殺炸彈客的志願殉道證明不了什麼，那麼遭到攻擊罹難的那些非志願的殉道者同樣也證明不了什麼。用那些受難者來製造道德論調，會是有些不體面和猥褻（obscene）的事（這麼說絕不是去否認他們的痛苦和死亡）。

另一類指責不真誠的論調：恐怖主義以他們的死亡換取天堂一席之地，他們的行徑並非廓然大公，因此，也非真誠。他們要表現無私公正，只有當他們不再信仰上帝，也像我們一樣，在死亡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基督教殉道者正是假定了這種崇高的等價性）。於是，這再度說明了他們進行的是一場

不公平的戰鬥，因為他們從中獲得了救贖，這種救贖甚至是我們一直無法盼到的。所以，我們哀悼死亡，而他們卻可以將自身的死亡兌換成極高額的懸賞。

根本地，所有這些——動機、證明、真理、報酬、目的和手段——都是一種典型的西方算計形式。我們甚至根據利率，以價值／價格比的說法來估量死亡。經濟的算計是窮人的算計——甚至是已不再有勇氣付出代價的窮人。

除戰爭外——戰爭本身只是一個傳統的安全防護罩——目前還會發生什麼？有人提到生化恐怖主義，亦即細菌戰或是核子恐怖主義。然而，這些都不再屬於象徵挑戰的層次，而是一種沒有冒險、沒有光榮、純粹和簡單的消滅：它是一種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的層次。將恐怖分子行動視為純然的依循摧毀邏輯的看法是有問題的。在我看來，跟死亡不可分的恐怖分子行動（也就是使之成為象徵行動），並不是對他者進行非個人化的消滅。每一件事都在於挑戰和決鬥，也就是說，每一件事都仍然處在具對立力量的兩造、個人關係中。是這一種力量在羞辱你，所以對方也必須要受到羞辱。而不僅僅是被消滅。它必須讓人丟臉。你絕不可能透過純粹的武力和消滅另一

方就可達成：它必須被鎖定成為目標，並在真正的敵對關係中受傷。除了透過誓約將恐怖分子集結在一起外，還有一種敵對雙方的雙邊誓約。這正好跟他們被指控是膽小鬼相反，同時這也跟美國在波灣所作所為相反（他們目前又開始在阿富汗發動戰事），在波灣戰爭裡目標是看不到的，目標只是操作程序上的消滅。

在這所有的變化中，伴隨著我們的是我們所看到的影像。我們有印象的必然是影像的衝擊性和它的吸引力。因此，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影像是我們原初的場景。當他們激進化世界局勢的同時，在紐約發生的事件也可以說激進化了影像與真實的關係。反之，我們過去處理的是一種大量不間斷的陳腐影像，以及大量天衣無縫的假事件。襲擊紐約的恐怖行動則使得影像和事件同時復活。

在體系的其他武器中，恐怖分子反過來用以對抗體系的，就是利用即時的影像以及它們立即性的世界傳播，就像他們利用股市炒作、電子資訊和航空交通一樣。影像的角色具高度曖昧性。因為，當他們拉抬事件時，同時也以事件為人質。影像可以將事件無限擴大，同時影像也是消遣和中立（已有一例，

即1968年事件)。影像消耗了事件，就此意義而言，影像吸納事件，又為了消費提供事件。無可否認的影像給予事件空前的影響力，然而這只是做為一種影像—事件的影響力。

假如真實在任何地方都遭到影像、虛擬和虛構的滲透，那麼這些東西如何跟真實事件站在一起？就現下這個例子，我們認為我們已經看到（或許鬆了一口氣）真實，真實的暴力在一個宣稱是虛擬的世界中復活。「你談到所有有關的虛擬都結束了——這是真的。」同樣的，在歷史被宣佈終結之後，它有可能被視為歷史的復活。但，真實真正超過虛構了嗎？假始真實看起來如此，這是因為真實吸納了虛構的能量，同時自己也成為虛構。我們幾乎可以說，真實妒嫉虛構，真實妒嫉影像。這是一種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決鬥形式，一場看誰最令人難以想像的鬥爭。

世貿中心雙子星的坍塌令人難以想像，但這還不足以使它成為真實事件。暴力的過度，也不足以開啟真實。因為，真實是一個原則，而這個原則早已失落了。真實和虛構糾纏在一起。對這次攻擊的著迷，主要是對影像的著迷（影像的令人歡欣鼓舞和災難式的結果兩者本身都有著高度的想像力）。

於是，在這事件中，真實就像是恐怖的紅利，像一種額外被添加進影像的**戰慄**：不僅令人害怕，同時更甚的是，它就是真實。並不是先有真實的暴力，再添上影像的**戰慄**。而是先有影像，再添加真實的**戰慄**。就像是額外的虛構，一種高於虛構的虛構。巴拉德（J. G. Ballard）¹（在波赫士[Borges]之後）提到這是將真實重新創造成最終極和最可怕的虛構。

恐怖分子的暴力在此既不是歷史的一種反擊，也不是真實的一種反擊。恐怖分子不是「真實的」。就某種意義而言，更糟糕的是：它是象徵的。暴力本身可能是全然的老套和無害。只有象徵暴力能衍生獨特性。在這一獨特事件中，在這部曼哈頓的災難電影裡，二十世紀兩個大眾著迷的要素：電影的白色法力（white magic）和恐怖主義的黑色巫術（black magic），影像的白光（white light）和恐怖主義的黑光（black light），結合

¹ 詹姆斯·巴拉德（J. G. Ballard）英國作家。巴拉德從小在中國的上海租借地長大，二次大戰期間，曾關在日軍的戰俘集中營，戰爭所暴露的人性殘酷與血肉橫飛對他後來的寫作有很大的影響。他被奉為「電腦叛客」，著有《太陽帝國》、《終端機海灘》、《水晶世界》與《至惡的大體解剖展覽》等，其中融合性、科技、精神分析、戀物的《超速性追緝》堪稱其巔峰之作。[中譯註]

在一起了。

我們回顧地試著賦予它某種意義，找出某種解釋。但，什麼也找不到。有的是景觀（spectacle）的激進性、景觀的殘酷性，只有這是原創和不可化約的。恐怖主義的景觀將景觀的恐怖主義強加給我們。對抗這一不道德的吸引力（雖然它宣洩了一種普遍的道德反動），政治秩序也無能為力。這是我們的殘酷劇場，是唯一留下給我們的——奇特的是，它將最極致的景觀和最高層次的挑戰結合起來。也就是，這既是一種能引起最大可能回響且令人目眩的真實暴力的微觀模型（micromodel）——最純粹的景觀形式——同時也是一種支撐起最純粹的象徵形式去挑戰歷史和政治秩序的獻祭模型（sacrificial model）。

我們可以原諒他們所進行的任何屠殺，如果屠殺有意義的話，如果屠殺可以解釋成歷史暴力的話——這是良善暴力的道德公理。我們也可以寬恕任何暴力，如果媒體沒有報導的話（沒有媒體，恐怖主義什麼也不是）。但，這完全是幻想。並不存在著媒體的「良善」運用。媒體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就是恐怖的一部分，媒體在這兩個方向操作。

就像恐怖行動本身一樣，鎮壓恐怖主義的行動也不可預料

的盤旋上升。沒有人知道它將在哪裡打住，或是否可能掉頭轉向。在影像和資訊層次，在景觀和象徵之間，不可能有所區別；在「犯罪」和鎮壓之間也不可能有所區別。這是一種可逆性（reversibility）不可遏制的釋放，也就是恐怖主義真正的勝利。我們可在事件的滲透和隱密的蔓生中看到這種勝利。不只直接在經濟、政治、金融整個體系的衰退中看到——以及造成道德和心理的低落——同時也在價值體系的暴跌，在自由和自由流通等等整套意識形態的衰落中看到這種勝利。而這些則是西方世界所自豪的，也是他們用來對其餘世界施加控制的價值體系。

中肯的說，自由的理念，一個新的和最近產生的理念，已經從心靈和習俗中逐漸消逝，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也正以其相悖反的形式產生，亦即，形成一種警察國家（police-state）的全球化，一種全控制，一種以法律和秩序為尺度的恐怖。解除管制最後的結果就是更大的限制和約束，這就像基本教義派的社會。

生產、消費、投機和成長都在下跌（但腐敗肯定不會下跌！）；這就好像全球體系正做出策略性的撤退，對它的價值

進行痛苦的修正——表面上是恐怖主義衝擊下的一種防禦性反應，然而實際上回應這種祕密指令的是：絕對的失序造成了強制性的管制，但體系也給自己加了一道管制——換句話說，就是內在化它自己的挫敗。

恐怖分子的另一種勝利面向就是，所有其他的暴力形式和秩序的去穩定化，其作用都對它有利。網路恐怖主義、生化恐怖主義、炭疽熱恐怖主義和謠言——所有這些都歸因於賓拉登。賓拉登甚至也可能宣稱自然災害是他造成的。所有混亂和反常流通的形式，都是對它有利的運作。普遍化的世界貿易結構有利於不可能的交換（impossible exchange）。它就像是恐怖主義的自動書寫，持續的受到非志願的新聞和資訊恐怖主義的補給燃料。接著會帶來各種恐慌的後果。正如目前的炭疽熱恐慌，立即形成的恐懼像歇斯底里般的自發擴散開來，就像化學溶液跟分子接觸瞬間結晶一般。這是因為整個體系已達到臨界質量，使得體系脆弱的禁不起任何的侵犯。

對這種極端情勢沒有任何的療法，而戰爭確定不是一個解決方案，它所給出的只不過是竄改過去，同樣龐大的軍事武力、假資訊、麻木的轟炸、情緒式和哄騙的語言、科技的部署

和洗腦。像波灣戰爭：一件非事件之事件（non-event），一件未曾發生的事件。

這確實是它的存在理由（raison-d'être）：以重複、篡改的假事件去取代真實而可怕、獨特而無法預料的事件。恐怖分子的攻擊符合了事件先於所有的解釋模式；反之，愚蠢的軍事、科技戰恰恰相反的符合了模式先於事件，因此，也符合了為了假賭注，為了一種不具競爭情境而進行的衝突。戰爭，透過其他方式成為政治不存在的延續。

* 本文寫於2001年10月，2001年11月3日發表於《世界報》。

雙子星輓歌

Requiem for the Twin Towers

黃宏昭譯

英譯本編按：

布希亞這篇關於2001年9/11事件論爭的演說講稿最初發表於紐約大學和「法國文化」(France Culture)在曼哈頓華盛頓廣場聯合舉辦的「北美洲哲學討論會」(Rencontres philosophiques outre-Atlantique)中。正式文章則於2002年2月23日下午在「法國文化」廣播播出。這場辯論大部分以法語進行，由Tom Bishop主持；其他參與者還有Jacques Rancière、Charles Larmore和Mark Lilla。紐約發表的演說講稿和目前這篇書面文章之間略有出入，註解乃英譯者Chris Turner所加。

9/11的攻擊，也是關於建築物的攻擊，因為遭摧毀的是世界最著名的建築物之一，連同所有的（西方）價值體系和世界秩序¹。

為了掌握雙子星大樓毀滅的象徵意涵，對這兩座樓展開歷史和建築的分析或許是有用的。

首先，為什麼是雙子星？為什麼是世貿中心的那兩座塔樓？

所有曼哈頓的高樓都滿足於在垂直高度上與其他大樓一較高下，它造就出反映資本主義體系自身的全景式建築——一座金字塔式的叢林，其最為人知的意象就是：當你從海上抵岸，（聳立的高樓）景象立即延伸到你跟前。這個意象在1973年後就改變了，因為世貿中心建造之故。這一體系的建築不再具有方尖或金字塔型的外觀，呈顯的是穿孔卡或統計表型狀。其建築的構圖法則就是，體系不再是競爭性的而是數位和可計數的

¹ 在紐約討論會中，布希亞以下面的評論做為這場演說的開場白：「要談論絕對事件是絕對的困難。也就是說，可以做為絕對事件分析的不是一種解釋（explanation）——正如我不認為知識分子或其他人有任何解釋這一事件的可能——而可以說是它的類比／附會（analogon）。這種分析就像這一事件一樣，令人無法接受，但留下／給予／觸動……讓我們說，象徵想像（symbolic imagination）多少有點像是這樣的方式。」

具體呈現，競爭已從體系上消失，讓位給了網絡與壟斷。

完美的平行六面體，坐落在四四方方的地基上，矗立一千三百餘呎高。完美的均衡，看不見內外的容器（blind communicating vessels）（他們說，恐怖主義是看不見的，然而這高塔也一樣看不見內外——龐然巨物，不再與外界接觸，而從屬於人工調節的環境）²。事實上，這高樓一式兩座，意味著任何原型指涉的終結。如果單只一座，就不能體現完美的獨佔性。只有符號的複製真正終結它所代表的。

這種複製有種特殊的吸引力。無論它們曾經如何的高聳，這兩座塔樓仍然意味著垂直高度的喊停。它們不同於其他建築物。兩座塔樓在彼此完全的對映（reflection）中，達到完美。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建築物玻璃和鋼鐵的外觀，則仍然在一種無止盡的反射（specularity）中，彼此鏡映（mirrored）著對方。但這雙塔不再有任何的外觀、任何的面向。因為，垂直修辭的消逝也是鏡映修辭的消逝。在那裡所保有的只不過是一個黑色的盒子，一系列接近數字II的造型，建

² 在紐約的演說講稿中，布希亞曾做此說明：是空調，也是心靈的調節。

築物猶如這一體系，好像現在都只是無性複製和不可變的基因密碼的產物。

究其整個歷史，紐約是世上唯一追隨此一體系當前形式的城市，所有紐約許多的開發，都相當忠實的反映這種體系。我們必須假設這兩座塔樓的倒塌——其自身就是一個現代城市史上的獨特事件——預示著一種戲劇性的終結以及所有這種建築形式和它所體現的世界體系的消失。這兩座塔樓的形狀像銀行和金融的純粹電腦圖像，可計數／可說明和數位化。就某種意義而言，這兩座是它的大腦。恐怖分子對那裡的攻擊，就是攻擊這大腦，攻擊這體系的神經中樞。

全球化的暴力也涉及到建築物，而暴力的反抗同樣牽連到建築物的摧毀。就集體的戲碼而言，我們可以說，對四千位葬身在塔樓內罹難者的恐怖跟在塔樓內生活的恐怖是不可分的——這是一種在鋼鐵、混凝土構造出的石棺中生活和工作的恐怖。

這些建築怪物，就像博堡中心（Beaubourg Centre），總是散發出曖昧難明的魅力，如同擁有一般現代科技極端形式所散發出的，一種具吸引力和排斥性的矛盾感覺。因此，在某些地

方，有著一股看著它們消失的隱密慾望。在雙子星大樓的例子中，則添加了某些特殊的東西，即精確的對稱性和雙生性／成對性。很明顯的，在這種複製和完美對稱性的美學特質中，有一種對形式破壞的完美犯罪，一種在劇烈的反作用力下，能夠引發誘惑去打破對稱，去恢復不對稱的形式套套邏輯，因此有其獨特性（singularity）。

這次的摧毀關涉到兩塔樓的對稱性：在幾分鐘的間隔下，在兩次的撞擊間，這種重複的攻擊，透露著一股懸疑。第一次衝撞後，人們相信這可能是一起意外事件。唯有透過第二次的衝撞，才確認了這是恐怖攻擊行動。而且一個月之後發生在紐約皇后區的空難事件³，電視台守候著（在法國）並持續追蹤這個事故四個小時，等著可能發生第二次撞擊的現場報導。因為（那第二次）並沒有發生，我們現在不可能知道，這究竟是一起意外還是恐怖行動。

³ 2001年11月12日，美國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巴士客機，墜毀於紐約皇后區，造成二百六十二人死亡，美國一度懷疑遭恐怖分子攻擊，事發四小時後指出，可能是引擎故障造成墜機，沒有跡象顯示是恐怖攻擊，並解除紐約地區的警戒。[中譯註]

雙子星大樓的坍塌是重要的象徵性事件。想像它們沒有坍塌，或只坍塌了一座，其效果絕不可能像現在一樣。全球權力的脆弱性，也不可能如此明顯的得到印證。這兩塔樓，曾是權力的表徵，以一種類似自殺的戲劇性結局體現這種權力。看著它們瓦解了自己，宛如內爆，人們有印象的是，它們正以自殺的方式來回應自殺飛機的自殺行動。

雙子星大樓是遭摧毀，還是自己倒塌了？讓我們清楚了解這事：這兩塔樓既是一物理、建築的客體，也是象徵性的客體⁴（金融力量和全球經濟自由主義的象徵）。建築的客體是遭摧毀了，然而象徵性客體才是被鎖定和被企圖摧毀的對象。人們可能認為實體的摧毀導致象徵性的坍塌。但事實上，沒有人，甚至恐怖分子也不曾，料想到這兩座塔樓會徹底的摧毀。究其實，是象徵性的坍塌造成實體的倒塌，而不是倒過來看。

就好像承受這些塔樓的力量驟然地失去所有的能量，所有的韌性；就好像傲慢的權力在一種極度努力的壓力下突然讓

⁴ 在紐約演說講稿的最後這一段，布希亞還加了一句話：「在比較薄弱的意思上來說，是象徵的，雖然如此，它還是象徵的。」

步：一直想成為獨特世界典範的那種努力。

所以這兩塔樓，已然倦怠於做為一種肩負太多重擔以致無法負荷的象徵，這次坍塌了，實體的、整個的坍塌了。神經般的鋼筋爆裂，雙塔筆直崩塌，像是洩了氣，而全世界在驚駭中觀看著。

然而，象徵性的坍塌之所以發生，是來自一場不可預期的共謀——就好像整個體系，因其內部的脆弱，加入了自己消滅自己的遊戲，因此，也參與了一場恐怖主義的戲局。相當合理，也相當無情的，權力的力量增加，提高了摧毀體系的意志。但不僅止於此，體系加入自身摧毀的行列。許許多多的災難電影見證這一幻想，他們企圖透過影像和特效進行驅魔。他們發揮的幻想是一個演出跟實際相去不遠的前兆（sign）——當體系接近完美或無所不能時，拒斥體系的成長力量就越大，包括內部的拒斥。曾經有句話說：即便是上帝也不能跟自己宣戰。然而，上帝可以。西方，正以上帝之姿（神授的主宰者和絕對的道德合法性），開始自我毀滅，並向自己宣戰。

就算他們失敗了，恐怖分子也成功的超出了他們狂野的希望：在攻擊白宮的笨拙行動中（對兩塔樓的攻擊則成功地超出

目標許多)，他們無意間證明了，白宮並不是關鍵的標靶，政治權力已不算什麼了，真正的權力在其他地方。至於我們該建造出什麼以取代這兩塔樓，這問題難以解答。相當簡單，因為人們想像不出有什麼相等的建築物具摧毀的價值，也就是值得被摧毀。雙子星大樓有著可摧毀的價值。在許多建築物中，人們說不出哪一座能像雙子星。大部分的東西甚至沒有摧毀或獻祭的價值。唯有深具名望的作品才得享這天命，因為這是一項榮耀。這一主張並不像乍聽之下那樣弔詭，它帶起了關於建築物的一個基本議題：人們應該建造的只有那些卓越且值得被摧毀的東西。懷著這項激進的想法舉目四望，你將會知道我們來到一個什麼樣的關口。沒有什麼擋得住這一極端的假設。

這把我們帶回到本來就應該是建築的基本問題上，建築師從未闡述過這一問題：去做這樣的建築和營造正常嗎？事實上，它不正常。因此，我們應該對這一工作，保持絕對的問題意識。無疑的，建築，好的建築的任務，就是抹除自身，完全的消失。雙子星，就塔樓本身而言，已經不見。但也留給我們其消逝的象徵，它們的消失成為一種象徵。它們曾經是全能的象徵，現在已因為它們的不存在，成為一個那種的全能可能消

失的象徵——這或許是一個更有力的象徵。不管全球主宰者後來變成怎麼樣，他們都將是曾經一度在此處被摧毀過的。

此外，這兩座塔樓雖已不在，但並未被消滅。甚至炸得粉碎之後，還讓人強烈感受到它們的存在。認識雙子星的人，沒有一個人可以不去想像這兩座塔樓以及在城市各方位的天際所留下的塔樓印象。它們在物質空間的終結反使它們轉向進入一個特定的想像空間。拜恐怖主義恩賜，世貿中心已成為全世界最美的建物——世界的第八大奇觀⁵。

⁵ 在發表了紐約講稿最後這段落的修正後，布希亞以下面的評論結束：我打算製作一首安魂曲，但就某種意義而言，它也是一首讚美頌（Te Deum）。

對恐怖主義的一些假設

Hypotheses on Terrorism

黃宏昭譯

從一開始，我們就可以拋開這樣的假設：9/11構成的只是通往不可逆的全球化途中的一起意外或事故。那是一種最終令人感到絕望的假設，因為某些不尋常的事情已在那裡出現了，否認它就等於承認今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構成事件，承認我們注定要演完這種全球權力的完美邏輯，而這種邏輯能夠吸納任何抵抗、任何對立，甚至可以透過如此作為來自我強化——恐怖行動只不過加速了單極權力和單極思考方式的全球性優勢。

與這種零度假設（zero hypothesis）對峙的是最大化（maximal）假設，一種在9/11做為事件的特性上的高度賭博——事件，在一個普遍化的交換體系中，被界定為那種意外創造出一個不可能交換（impossible exchange）的地帶：在這事件自身核心中，死亡的不可能交換，以及任何對於這一事件的各種論述的不可能交換。這就是它的象徵性潛能，也正是這種象徵性潛能在曼哈頓事件中震撼了我們所有人。

依照零度假設，這起恐怖主義事件沒什麼重要意義。它應該不曾存在，基本上它不存在。這是一種根據邪惡只是幻影或是一樁在良善（Good）軌道上的意外變化的觀念來看待事情——就這事件，即是世界秩序和快樂的全球化的軌道。神學總

是將自身立基於邪惡本身的不真實上。

另一種假設：這是一種自我毀滅的瘋子、精神病患、具反常動機狂熱分子的行為，他們受到某種邪惡力量的操控，這種力量只是利用被壓迫人民的妒恨和恨意滿足其毀滅式的暴怒。同樣的假設——但更具好意的說法，企圖提供恐怖主義歷史性的理由——就是視之為被壓迫人民絕望的真實表達的那種假設。但這種論調就是自己的嫌犯，因為它迫使恐怖主義只在一種無能的特定姿態下，去代表全球的不幸。即使它承認恐怖主義是全球秩序政治抗爭的特殊形式，這通常也只用來做為譴責這種抗爭形式的失敗，同時也譴責了它的未預期後果，也就是恐怖行動不自覺地鞏固了那個全球秩序。這是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¹提出的說法，當他在譴責霸權力量的同時，也指責恐怖主義是霸權秩序的孿生——這一體系的邪惡雙胞胎。接著，跨出一小步想像，即使恐怖主義不存在，這一體系也將創造出它。那麼，又為什麼不將9/11的攻擊行動看做是

¹ 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印度裔英籍作家，人權運動積極參與者。1997年以《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獲英國布克文學獎（Booker Prize）。
[中譯註]

CIA的表演花招？

再者，這也假定所有的對抗暴力，最後都與這一既定秩序共謀。這是剝奪了行動者的意圖以及以他們的行動為賭注的資格。這是將行動化約到它的「客觀」後果（9/11地理政治學的後果），而且絕不是根據行動自身的潛能來看待它。然而，不管如何，究竟是誰正在操縱他們？是誰正在玩另一方的遊戲？在這事件中，恐怖主義也同樣從體系的進步中獲益，他們為了獲取力量，與敵對者沿著平行的軌道競賽，跟在階級衝突和歷史戰爭中所發生的完全不同，他們從不相遇。

我們甚至該更進一步：不是恐怖主義與這一世界秩序之間「客觀」共謀關係的假設，我們應提出一個完全相反的假設，亦即，在那一力量和這一來自外面對抗它的力量之間具有深度內在共謀關係的假設；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一種內部的不穩定和脆弱，半路遭遇到恐怖行動激烈搖撼的假設。沒有這種隱密的結合、這種共謀傾向的假設，我們對恐怖主義將一無了解，也不可能擊敗它。

如果恐怖主義的目的只是透過自己的力量，以一種正面對撞的方式去搖撼全球秩序，那就荒謬了：這種力量關係是如此

的不對等，而且無論如何，全球秩序已經是一個如此失序和解除管制的場所，以致不管添加什麼都毫無用處。我們甚至藉著這種添加進來的失序，而甘冒強化治安和安全控制體系的危險，一如我們當前在各方面看到的。

然而，或許那是恐怖分子的夢想：一種永恆敵人的夢想。因為，如果不再有這種敵人，要摧毀它就變得很困難。無可否認的，這是一種套套邏輯，而恐怖主義就是套套邏輯，它的結論是一種弔詭的詭辯：假如國家真的存在，國家將賦予恐怖主義政治意義。然而恐怖主義顯然沒有任何政治意義（雖然有其他意義），這就是證明：國家不存在，而且國家的權力是可笑的。

那麼，恐怖分子隱匿不宣的訊息是什麼？在納斯瑞登（Nasreddin）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他每天趕著一群載滿麻袋的騾子穿越邊境，每一次麻袋都遭搜查，但什麼也沒找到。納斯瑞登繼續趕著他的騾子穿越邊境。久而久之，有人問他，他真正走私的是什麼。納斯瑞登回答：我走私的是騾子。

同樣道理，我們可以懷疑在所有恐怖行動表面動機——宗教、殉道、復仇或策略的背後，真正走私的是什麼？很簡單，

就是透過我們看起來像是自殺的東西，死亡的不可交換，透過死亡的象徵性禮物挑戰體系，成為了一種絕對的武器（雙子星大樓似乎已認知到這點，它以自身的坍塌做為回應）。

這是最高假設：恐怖主義最終是沒有意義、沒有目標，而且不能被它「真實的」政治和歷史結果衡量。弔詭的，正是因為恐怖主義沒有意義，使它得以在一個不斷充滿意義和效能的世界裡，構建出一個事件。

這種最高假設是這麼一種假設：超越恐怖主義的奇觀式暴力、超乎美國和伊斯蘭，將恐怖主義設想為全球化過程核心中一種激進對立的浮現；一種不可化約為世界整合（integral）技術及其心智實現的力量的浮現，一種不可化約為完成全球秩序此一無法阻擋運動的力量的浮現。

一個有活力的對反力量正跟這一體系的死亡力量格鬥。一種對完全融於流通和交換的全球性的反抗力量。一種不可化約的獨特性力量，當體系擴張其霸權——達到一個像9/11那樣的斷裂性事件時，而更顯得激烈，這種獨特力量並不是去解決對立，而是在一擊中，賦予它象徵性的面向。

恐怖主義既沒有創造出什麼，也沒有開啟出什麼。它只是

將事情帶到極端，推到引爆點。它惡化了某些事物的狀態，惡化了不確定性和暴力的某些邏輯。體系本身，透過所有交換的炒作擴張，把隨機和虛擬的形式強加在任何地方——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²、浮動的資本、強制的流動和加速，導致了一個不穩定的普遍原則廣為盛行，恐怖主義只是將它轉譯成全然的不安全。恐怖主義是不真實的和非現實主義的嗎？然而，我們的虛擬真實、我們的資訊和溝通系統，其自身且長久以來，也已超越了這種真實原則。至於恐怖，我們知道它早已出現在任何地方，在制度性的暴力中，既是精神的也是身體的，以及在順勢療法（homeopathic）的劑量中。恐怖主義只是將所有懸置的成份結晶化／具體化。恐怖主義對雙子星大樓所體現的力量、解放、流動和算計性的狂歡展開最後一擊，同時也是對那種效能和霸權極端形式的激烈解構。

所以，在零地（Ground Zero）、在全球權力的瓦礫堆中，我們只能絕望的找到自己的意象。

事實上，在零地中看不到任何其他東西——甚至看不到一

² 用比以前傳統的生產系統還少的各種資源來達成大量的產出。[中譯註]

個不可見敵人懷著敵意的徵兆。普遍存在的只有美國人民對自己的無盡憐憫——滿是星條旗、紀念文告、罹難者以及那些後現代英雄，消防隊員和警察的膜拜儀式。憐憫成為一個想要獨自與神同在的民族的國家激情，與其視為受到某種惡勢力的擊倒，寧願認為自己遭到的是神譴。「神佑美國」已成為：「終於，神鞭擊了我們。」驚駭，但最終要永恆的感激這一使我們成為受難者的神的眷顧。

道德意識的論證如下：由於我們是良善的人，只有邪惡才能攻擊我們。然而如果對那些視自己為善的化身的人，邪惡無法想像，那就只有神才能攻擊他們。然而，為何要懲罰他們？還不都因為德行和權力的過度，因為善和權力的無所區隔所顯示出的這種過度性？這是一種因為善和良善的化身走得太過頭的懲罰。但這不會讓他們不悅，也不會阻止他們安心的繼續為善。從此，他們發現更獨自與神為伍。從此，對邪惡的存在更無所察覺。

這種憐憫的學生姐妹（就像雙子星一樣的學生）是傲慢自大。你為自己的不幸掉淚，同時你又是道德高尚者。而給我們權利做為道德高尚者的就是從今以後，我們是受難者。這是完

美的不在場證明 (alibi)；正是這整套的受難精神衛生學，所有的罪行被解決掉了，而且允許人們去使用這種不幸，就像不幸是所謂的信用卡。

美國人少了一個像這樣的傷口（他們在珍珠港遭遇的是戰爭行為，而不是象徵性的攻擊）。這是典型的命運逆轉，因為國家的心臟最後受了傷，同時，為了彌補，心安理得的自由施展其權力。一種科幻小說從開頭就夢想的情節：某些矇矓難解的力量將徹底摧毀他們，而這力量在此之前只存在於他們的無意識中（或是他們心靈的某些幽微之處）。突然的，透過恐怖主義的美好恩典，夢想實現了。邪惡的軸心抓住美國人的無意識，並透過暴力實現了它，這暴力本來只是一種奇想與夢幻的念頭。

所有的一切都起因於他者 (Other) 是難以想像的事實，就像邪惡。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對他者——不管朋友或敵人——在其徹底的異己性 (otherness)，在其不可調解的外來性 (foreignness) 上想像的不可能。一種拒絕，深植於跟環繞著自身的道德價值和技術力量全然認同的拒絕。這正是美國視自己為美國，而且剝除了異己性，帶著強烈的憐憫看待自己。

讓我們弄清楚：美國在此只不過是一種寓言或普遍形象：任何不可能去忍受其對立幽靈（spectre of opposition）的權力。除非是個白癡、精神病患或是怪人，他者，要如何才能成為與眾不同，無可救藥的與眾不同，甚至沒有慾望報名加入我們普世福音的行列？

就是這種帝國的傲慢——如同波赫士小說中的寓言（鏡子的民族）³，在這裡戰敗的人民被放逐進鏡子裡。他們被迫在鏡子裡去反映征服者的影像（然而有一天，他們開始越看越不像他們的征服者，最後，他們擊破鏡子並再次攻擊這帝國）。

同樣放逐到像這種鏡子裡的有菲力普·默瑞（Philippe Muray）發表的《親愛的聖戰軍》（*Dear Jihadists*）⁴：「我們製造你們，聖戰軍和恐怖分子，你們最後將成為這種鏡像似的囚犯。你們的激進主義是我們留給你的東西。我們能如此做，是因為我們對任何事情冷漠，包括我們自己的價值。你殺不了我

³ 見〈鏡子的群系〉（Fauna of Mirrors），收於《想像存在之書》（*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p. 67-68）。[英譯註]

⁴ 見Philippe Muray, 《親愛的聖戰軍》（*Chers djihadistes*, Paris: Mille et une nuits, 2002）。[英譯註]

們，因為我們已死。你們認為正在跟我們戰鬥，但卻毫無自覺地站在我們這邊。你們已被同化。」或者其他段落：「你們做的很好，但你們只是做為一種獨特力量把自己殺光……透過你們的行動，你們已重新進入所憎恨的全球戲局中。」

這是我們瀕死文化賤斥（abject）本質的一項說明，但也是以任何暴力對抗它都歸失敗的一項說明，或是相信其終歸如此的一項說明。可憐的反叛，可憐的天真。「我們將擊敗你，因為我們比你更沒有生命。」然而這跟此刻爭議的死亡是不同的。當西方文化看著它一切價值一個個消失後，它以最糟糕的方式，向內攻擊自己。我們的死亡是一種滅絕，一種消滅。這不是象徵性的籌碼。我們的貧困展現於此。當獨特性以自己的死亡投入這圈圈中，它逃離了這種慢性的滅絕，它自己得以壽終正寢。這是一種無盡的複製或退出的遊戲。在自殺中，獨特性同時也讓另一方自我了結。我們真的可以說恐怖行動讓西方自殺。以死亡換取死亡，然而象徵性的賭注已將它轉形。默瑞說道：「我們已經破壞了世界，你還想要什麼。」但準確的說，我們只是破壞了這個世界，世界仍須被摧毀，象徵性的摧毀。這兩種做法絕不相同。雖然我們已做了前半段，只有另一

方能繼續完成後半段。甚至在報復和戰爭中，我們可見到依舊缺乏想像力——依舊沒有能力將另一方視為羽翼已豐的敵手，依舊是魔幻式解決，也就是無禮的消滅和抹除它。

讓伊斯蘭成為邪惡化身，將會為他增添光彩（在過程中也給自己增添了光彩）。然而，我們不是以那種方式看事情：當大家說伊斯蘭是邪惡，所暗示的就是伊斯蘭是不好的、是病態的，它是暴力的，因為它有病，因為它視自身為遭羞辱的受難者，所以它餵養著自己的怨恨而不是歡愉地參與世界新秩序。伊斯蘭是退化且出於絕望的基本教義派。然而如果它變得具攻擊性，那麼就必須將它化約成無能。簡言之，伊斯蘭不是它應該是的那樣。那麼，西方的情況又怎樣呢？

我們同樣壓根兒沒能料想到，這些狂熱分子可以「完全自由」的獻身，而絕不是在盲目、瘋狂或被操控的狀態。因為我們壟斷了善與惡的評斷權，其意義在於獨一的「自由和負責任」的選擇不得不跟我們的道德律則保持一致。這意味著將任何抗拒和違犯我們價值的，都歸咎於一種盲目意識（然而，這種盲目從何而來？）。那種「自由和啟蒙」之士必會選擇善，是我們普遍的偏見——同時這也是一種弔詭，因為分配到理性抉擇

能力的人類，最後不再能夠自由的抉擇（精神分析也專門從事於這些抗拒的詮釋）。

就這觀點，德國諷刺作家李登伯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告訴我們一些奇怪且更具原創的看法——那就是，正當的使用自由就是去濫用自由，且過度的使用自由。這包括了要對自己的死亡以及他人的死亡負責。由此，這種落到恐怖分子頭上「懦弱膽小」的稱號：懦弱膽小因為選擇自殺，懦弱膽小因為犧牲無辜（當我們不是控訴他們利用這些行徑通往天堂時），就很荒謬。

同樣的，我們應該試著去超越這種對人類生命無條件尊重的道德律令，而且設想我們可以在他人也在自己身上，去尊重某些不是生命以及不只是生命的東西（生存不是最重要的，它甚至是事物中最不重要的）：命運、大義、自尊的形式或犧牲奉獻的形式。象徵性的籌碼遠超過生存和自由——我們發現失去生存和自由是不可忍受的，因為我們使它成為一種普遍人道主義層次的拜物價值。所以我們無法想像一種完全忠於自主和「良知自由」的恐怖行為。目前，抉擇，就象徵性義務而言，有時是相當神秘不可思議的——就像羅曼（Romand）的故

事，此人擁有雙重生活，他殺害了全家，不是為了怕身分被揭穿，而是怕他的家人發現他的欺瞞時受到極度失望的打擊⁵。自殺不可能從這紀錄中除去罪行；他只可能將羞恥留給它人。勇氣在哪裡？懦弱在哪裡？自由的問題，不管是我們自己或他人的，不再能夠以道德意識的方式提出，而更高層次的自由必須讓我們能做到濫用或犧牲自由的地步。奧瑪·珈音（Omar Khayyam）說：寧願一個自由的人給愛的鎖鏈鎖住，也不要釋放一千個被羈押的囚徒。

從那樣的觀點中我們看到了，這幾乎是支配之辯證的一種顛覆，主—奴關係的一種弔詭的逆轉。在過去主人是那種暴露於死亡、且可以跟死亡賭一把的人，奴僕則是一種死亡和命運都被剝奪的人，一種注定成為殘存者和勞動的人。目前實際情況又如何？我們，有權有勢的，此刻正躲避死亡並且在各方面受到過度保護，完全佔據了奴僕的位置；反之，那些聽任自己支配死亡的人，以及那些不是以生存做為他們唯一目標的人，

⁵ 見 Emmanuel Carrère, 《敵人：謀殺和欺瞞的真實故事》（*The Adversary: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Deception*, trans. Linda Coverdale, London: Bloomsbury, 2001）。

〔英譯註〕

就是目前象徵性的佔據主人位置的人。

另一個重要的反對意見——這次跟動機無關，而是跟恐怖行動的象徵性旨意有關。在9/11的攻擊中——在對勝利的全球化邏輯激烈挑戰之中，我們是否正在與某種較強意義上的象徵行動交涉（也就是說，隱含一種價值的形變和轉向）？例如，依照卡洛琳·海瑞奇（Caroline Heinrich）的說法，恐怖分子在價值和更高真實體系的名義下去攻擊一種擬仿（simulation）和冷漠（indifference）的邏輯，這只可說是重新活化了新的認同邏輯。「反抗這種冷漠邏輯，」她說道，「恐怖分子正試著將不再有任何意義的東西恢復意義。」對我們來說，「真實」（The Real）就是這樣——也就是說，一種指涉的幻象（referential illusion）——恐怖分子只能說是從古老過去挖取新的籌碼和新的價值來取代真實。

默瑞也因這樣批評了他們：「我們已經清除了所有我們的價值；那確實曾是我們整體的歷史感，然而你又把我們帶回到你們的幻象價值、幻象認同，你們的『正直』上，也就是你們用這些來對抗一個分離裂解的世界。」恐怖分子正把「擬仿」指涉體（‘simulation’ referents）（雙子星大樓、市場、西方大文

化[mega-culture]) 當真看待。對抗這種整合式交換的非人性，他們再次開啟一種真理的形上學（還是沿著卡洛琳·海瑞奇的論點）。這一論點就是，不是對擬仿報復，而是對真理本身報復。攻擊擬仿是沒用的，如果它意味著掉回到真理；攻擊虛擬是沒用的，如果它意味著掉回到真實。

依照卡洛琳·海瑞奇的說法，當恐怖分子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擬仿時，愈是這樣：恐怖行動是模型所衍生出來的。它甚至是一個模型先於真實的很好例子（好萊塢電影導影曾被反恐策略家請來做為顧問）。更進一步說，恐怖行動在各方面都以這一體系的科技手法為模型。那麼，跟這一體系玩同樣的遊戲，他們如何宣稱能推翻他們的目標？

這是個強烈的反對論調，但這是個化約的論調，把自己局限在恐怖分子藉以宣稱以更高真理之名有效對抗全球體系的宗教和基本教義派論述中。然而，令其成為象徵性行動的不是在論述，而是在行動本身，一種可以造成「可逆性極小激增」（minimal irruption of reversibility）的行動本身。恐怖分子正透過一種，也正是他們犯罪的時刻，既不具真實意義，也不是另一個世界的指涉的行動，對整（合）體真實（integral reality）

的體系進行攻擊。目標只是要利用體系自己的武器去破壞體系——這體系對其自身的價值冷漠。甚至不只是體系的科技武器，他們所利用的關鍵武器，且成為決定性效果的，就是在體系核心中的非意義（non-meaning）和冷漠。

這一反轉和推翻權力的策略，不是以道德或宗教對抗之名，也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對那種全球性權力全然且單純的不滿的結果。

此外，要去發現全球秩序的令人不滿，無需成為伊斯蘭教徒，也無需訴諸更高真理。不管是不是伊斯蘭教徒，我們都是共同遭到根本拒絕的人，而且在這權力自身的核心中就有許多裂縫和混亂的徵兆——脆弱的徵兆。這就是恐怖行動的「真理」。沒有什麼其他更好的真理可以取代，所謂的基本教義派真理當然也不能。

恐怖主義所復活的是一些無法在差異和普遍交換體系中交易的東西。差異和冷漠彼此可以進行完美的交易。構成事件的就是那種不具等值性的東西。在某種超驗的真理上，恐怖行動是不具等值性的。

當卡洛琳·海瑞奇將塗鴉與恐怖主義對立並舉當做一種嚴

格的象徵性行動時，就塗鴉所表達空無一物的意含以及使用空洞符號將其化約為荒謬這方面來說，海瑞奇並沒有自覺到她是多麼的正確。塗鴉的確是一種恐怖行動（本身也是以紐約做為它的源起地），不是透過它的認同性宣稱——「我是某某，我存在，我住在紐約」——而是透過它在都市的建築和牆面上的「去書寫」（disinscription），一種符徵（signifier）自身激烈的解構（遭塗鴉一刺青的地下鐵，準確的駛入紐約的心臟，正像恐怖分子將波音客機衝進雙子星大廈一樣）。

這問題就是「真實」（Real）的問題。依照紀傑克（Slavoj Žižek）的說法，二十和二十一世紀的熱情就是追尋真實的末世論（eschatology）熱情，對一種失去或消逝目標的鄉愁式熱情⁶。而且恐怖分子最後可能被說成只是去回應這種對真實悲愴的需求。

對菲力普·默瑞而言，也是，聖戰士恐怖主義也只是瀕死

⁶ 見 Slavoj Žižek, 《歡迎光臨真實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p. 5）。（有一點應指出，布希亞寫此文時並未看過這本書，他只看過紀傑克一篇很短的會議論文。紀傑克在這篇文章所提的「對真實的熱情」，據知應該出自 Alain Badiou 一本尚未出版的書，書名《*Le Siècle*》）。[英譯註]

真實的最後騷動——一種戲劇般的歷史目前即將走到盡頭以及因為它的垂死而癱瘓的後果。然而，這種對真實和歷史秩序的呼喚本身就是種悲情的事物，它與較早的階段相符合，而非目前那一種全球化的整體真實的階段。在此階段，沒有任何否定性可以給出什麼回應。面對這一全球體系整合主義的（integrist）攻勢，回應只能來自獨特性的爆發，而獨特性，與真實毫不相干。

9/11 事件林林種種的說法中，最新以及最古怪的說法就是這一切都是內部的恐怖分子陰謀策劃下的產物（CIA、極端右派的基本教義派等等）。當五角大廈的空襲，甚至連雙子星大廈的空襲都蒙上一層疑雲時，就出現了這樣一篇論文（席瑞·密賢 [Thierry Meyssan] 的〈9/11：大謊言〉[9/11: The Big Lie]）。

如果它全然不真實的話該如何？如果它完全是偽造的話該如何？一篇論文如此的不真實以致應受到考慮，就像任何特殊事件都應被懷疑：我們本身總是既需要一個激進的事件，也需要一個完全的欺瞞。骯髒陰謀的幻想，確實相當常被證明為真：我們早已數不清各式各樣的祕密團體和機構所搬演的挑釁

的謀殺行動、攻擊和意外事故。

超越了事物的真理，在我們或許從未搞懂的事物真理之上，上述這篇論文所剩下來的，依舊是：那宰制的權力就是這一切事物的煽動者，包括顛覆和暴力的效果，這些都屬視幻覺畫（trompe-l'oeil）層次的效果。而最糟糕的是，那是我們自己再次幹下來的罪行。不可否認，這對我們民主的價值沒帶來什麼光彩，不過它仍然要好過把這種令我們遭到失敗打擊的力量讓渡給身分低賤的聖戰士。早自洛克比波音客機空難事件（1988/12/21）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傾向於說是機械故障而不說是恐怖分子的行動。雖然承認自己缺點是件嚴重的事，不過它仍然好過承認其他方的力量（這並沒有排除對邪惡軸心偏執的譴責）。

如果證實了這種神秘化的可能，如果這事件全然出於偽造，那麼很清楚，這將不再有任何象徵性的重要意義（如果雙子星大樓從內部炸掉——撞擊並不足以造成大樓的坍塌——那就很難說雙子星是在自我毀滅）。這將只是一件政治的陰謀。然而，……即使所有這一切是某些派系的極端分子或軍方所為，它仍然成為一種自我摧毀的內在暴力的徵候（就像奧克拉

荷馬州的爆炸案)，一種社會的隱匿傾向造就了自身厄運的徵候——就像CIA和FBI高層之間爭吵不和所顯示的，透過相互抵銷資訊，他們給了恐怖分子一個前所未有的成功機會。

9/11以暴力的方式引起了真實的問題，這一奇幻的陰謀論調就是這一問題的想像的副產品。於是乎，或許這一論調會四處遭到猛烈的拒絕。難道是因為這論調可能被視為反美，以及在幫恐怖分子脫罪嗎？（然而幫恐怖分子脫罪就是去減輕他們對這事件的責任，這又再度回到一個輕蔑的看法，即伊斯蘭絕對沒有能力幹出如此事蹟）。不，正是這一論調的「否認」面向，有點兒說明了這種反動的暴力。真實的否認本身就是恐怖主義的。任何一切都好過去質疑真實本身。應該拯救的，首先就是真實原則。「否定主義」（negationism）就是頭號的公敵⁷。事實上，我們目前大部分生活在一個否定主義的社會裡。沒有事件再是「真的」（real）了。恐怖攻擊、審判、戰爭、貪腐、民意調查——現在，沒有一件事是不被操縱或是無法決定的。

⁷ 法文「négationnisme」這個字眼經常意指的就是英文裡的「對大屠殺的否認」（Holocaust denial），很明顯的這裡擴大了這意涵。[英譯註]

政府，權威當局和機構就是這種真理和真實原則墮落的首要受害者。不信任猖獗著。陰謀論只是在心靈不穩定的情節中加入某些滑稽諷刺的插曲而已。於是乎，迫切需要對抗這種到處蔓延的否定主義，並且不計代價的保衛一種靠吊點滴維生的真實。雖然我們可以安置很好的鎮壓和嚇阻機器去對抗身體的危險和恐怖主義，但可能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們免除精神的不安全。

此外，所有的安全策略只是恐怖的延伸。恐怖主義真正的勝利就是它把整個西方投入於安全的著魔中——也就是投入一個永恆恐懼的朦朧形式中。

恐怖主義的幽靈（spectre）就是迫使西方讓自己感到恐怖——全球的治安網絡正等同於普遍冷戰的緊張狀態，一種將緊張銘刻在身體和習慣上的第四次世界大戰。

例如，世界領袖最近在羅馬會面簽署，並聲明一份最終結束冷戰的協議。他們甚至沒有離開機場，他們停在鋪著柏油的跑道上，四周圍繞著防彈車、鐵絲網和直升機——也就是說，透過這種新冷戰的所有符號，這是一場安全武裝的戰爭，對一個不可見敵人永恆嚇阻的戰爭。

雙子星大廈的消滅，政治性或經濟性而言，都不曾牽制到全球體系。關鍵的是一些其他東西：這次攻擊的震撼性衝擊，其（全球體系）成功的傲慢以及（攻擊）造成可信性喪失，形象的坍塌。因為體系要能發揮作用只有體系自己跟自己的影像交換，同時去反映自身就像雙塔的雙生相映一樣，並在一種理想指涉中發現自身的等值物（equivalent）。正是這種因素使得體系無懈可擊——而正是這種等值性被擊碎了。就在這意義上，儘管像恐怖主義一樣難以捕捉，全球體系仍遭受到了攻擊，正中心臟。

全球的暴力

The Violence of the Global

黃宏昭譯

當前的恐怖主義不是一種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和狂熱主義的傳統歷史的後裔。它與全球化同時發生，為了掌握它的特性，我們有必要簡要的重溫全球化的系譜，它跟普世的（the universal）和獨特的（the singular）之間的關係。

在「全球的」（global）和「普遍的」（universal）這些用詞間，有著令人受騙的雷同性。普世性（universality）是人權、自由、文化和民主的普遍性。全球化是科技、市場、觀光和資訊的全球化。全球化似乎不可逆，反之，普遍性看似有點快過時了。但至少，當普遍性在西方現代性的規模上建立自身做為一種價值體系時，在其他任何文化中還找不到可以跟它相當的。

任何文化的普遍化（universalize），都會喪失它的獨特性而且死亡。所有那些我們藉著強行將它們同化而遭摧毀的文化，就是這樣造成的，同時這也是我們自己的文化自稱是普遍性的說明。其差異在於其他的文化死於它們的獨特性，這是一種美好的死亡；反之，我們的文化則因所有獨特性的喪失、所有價值的滅絕而瀕死，這是一種低劣的死亡。

我們以為任何價值的理想目標就是將它提升到普世性，卻

沒有評估這種提升所代表的致命危險：這絕不是一種提高，這是一種趨向零度價值的稀釋。啟蒙時代，普世化以一種不斷上升的進步過程，過度的出現。今天，普世化以缺席的方式，以逃進最低公分母的方式出現。人權、民主和自由就是這樣產生的：它們的擴張與它們最弱的定義相一致。

事實上，普世性在全球化中慘遭不幸。貿易的全球化終結了價值的普遍性。這是單線思考戰勝普遍思想。全球化最早的就是市場、大量的交換和豐富的產品、貨幣的不斷流動。從文化意義上看，這是所有符號和所有價值的混雜，換言之就是色情。因為所有一切在網絡上出現的全球性散播就是色情：無須性的猥褻，這種互動式的交媾就夠了。在過程的終端，全球和普世不再有任何差異。普世本身被全球化了；民主和人權就像任何其他的全局性商品——如石油或資本——一樣的流通。

從普世移轉到全球所帶來的既是一種同質化也是一種無限的碎裂化。中央並不是對地方（local）讓步，而是對錯位（dislocated）讓步。集中（concentric）不是對去集中（decentred）讓步，而是對離心（eccentric）讓步。而且，區別和排除不是意外的結果，它們都是全球化邏輯的一部分。

那麼，我們可能會懷疑，普世性是否尚未被它的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壓垮，是否它和現代性曾經存在於除了論述和官方道德之外的任何地方。至少，對我們而言，普世性的鏡子已破碎。但，這或許是個機會，因為在這破裂鏡子的碎片中，所有的獨特性正重新浮現：那些我們信以為瀕危的正生存著，而那些我們認為已滅絕的正重燃生機。

當普世價值失去權威和合法性，這種情境逐漸被激進化。只要普世價值能確立自己做為中介價值，它們多多少少可以成功的將獨特性當做差異，整合進差異的普世文化中。然而，它們目前不再能如此，當勝利的全球化已沖走所有差異和所有價值，一種全然冷漠的文化（或缺乏文化）正被帶進來。一旦普世性消失，所留下的是最強大的全球科技結構，它會再次對立於目前已恢復為野生且自由自在的獨特性。

普世性曾有它的歷史機會，然而今日，一方面遭遇到毫無選擇餘地的全球秩序，另一方面也同時遭遇到獨特性兀自漂離或衝撞體系，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觀念，所劃出的是一道蒼白的身影，只成了普世性消逝的鬼魂。

普世性是超驗（transcendence）的文化，是主體和觀念的

文化，是真實和再現的文化。全球虛擬空間是螢光幕和網絡的空間，是內在性的空間和數位的空間，沒有維度的空間—時間。在普世性中仍對世界、對身體、對記憶有著一種自然的指涉。有一種在歷史和革命暴力中找到它們自己形式的辯證張力和批判運動。正是對這種批判否定性（critical negativity）的排除，開啟了另一種暴力，全球性暴力：亦即實證性的優勢以及技術效能、全控組織、整合的流通，所有等值交換的優勢。從此，與啟蒙和普世性密不可分的知識分子角色終結——而且也是那些與矛盾和歷史暴力相繫的激進分子的終結。

全球化是不可逃避的嗎？除了我們自己的文化外，所有文化都以某種方式逃離了抽象交換的命定結果。而過渡到普世性以及其後過渡到全球性的關鍵門檻在哪裡？驅動這世界成為觀念抽象化那令人昏眩的漩渦是什麼？而另一個驅動世界進入觀念的無條件實現那令人昏眩的漩渦又是什麼？

普世性曾是一種觀念。當它在全球性中自我實現時，做為觀念，做為一種理想目的，普世性就自我了結了。它已成為單獨的指涉——一種內在於自身的人性佔據了已死上帝的空洞空間——人類目前獨自在統治，但不再有終極的根本理由。不再

有任何敵人，於是從內部滋生敵人，而且分泌各種非人的新陳代謝。

於是這種全球的暴力隨之而來。這是一種體系追獵出任何否定性或獨特性形式的暴力，包括追獵那種獨特性的最終形式，也就是死亡自身。這是一種在社會裡衝突被虛擬地禁止以及死亡被禁制的暴力。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一種終結了暴力本身的暴力，而且著手建立一個不受任何自然秩序沾染的世界，不管它是身體、性、誕生或死亡。不只是暴力，的確，我們應論及惡性病毒。這種暴力是病毒：它透過感染、透過連鎖反應運作，它也逐漸摧毀我們所有的免疫力和去對抗它的力量。

無論如何，這些東西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全球化並不是一開始就贏得這戰爭。面對這種同質化、消解的權力，我們看到異質性的力量在每一地方崛起——不僅僅是差異，也是敵對。在這逐漸提高對全球化的抗拒、社會和政治抗拒的背後，我們不應視為只是一種老舊的拒絕：一種對於現代性的成就與「進步」的令人痛苦的修正主義，一種不僅是對全球科技結構的拒絕，也是對所有文化等值的精神結構的拒絕。這種復甦假定了

一些面向，這些面向從啟蒙思想的立足點來看，似乎劇烈、異常、不理性——既是族群、宗教和語言的集體形式，也是情緒性騷動或神經質的個體形式。譴責這些高漲的情緒為民粹主義、古舊的或甚至是恐怖主義，將是一種錯誤。在今天，構成一起事件的任何東西都是如此反抗這種抽象的普遍性——包括伊斯蘭對西方價值的敵意（正因為伊斯蘭是如此激烈的對抗這些價值，才成為我們目前的頭號敵人）。

誰能遏阻這全球體系？肯定不是反全球化的運動，它們唯一的目標就是攔阻管制的解除。它的政治影響或許很可觀，但它的象徵性影響是零。那種暴力仍然是一種內部變動，體系足以克服而且還能保有上風。

能夠遏阻體系的不是積極的替代出路（alternatives），而是獨特性。獨特性既不是積極也不是消極。它們不是一種替代出路；它們屬於另一層次。它們不順從任何價值判斷，或服從任何政治真實原則。它們，從後果來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糟的。它們無法在一種普遍的歷史行動中被結合起來。它們挫敗任何支配性、單邊的思想，但它們不是單邊的對抗思想：它們創造自己的遊戲和自己的規則。

獨特性不必然都是暴力的，有一些比較微妙，諸如語言、藝術、身體和文化，還有一些比較猛烈，恐怖主義就屬其中之一。正是恐怖主義為這些在單極全球權力建制下付出消逝代價的所有獨特文化復仇。

這不是一種「文明衝突」的問題，而是一種——幾乎是人類學的——在無差異的普世文化和任何不管在什麼場域都保有某些不可化約的他性（irreducibly alterity）事物之間的對抗問題。

對全球權力而言——它就一如整合論者（integrist）那般地宗教正統派——所有差異、獨特形式都是異端。依此解釋，它們，不管是否喜歡，注定了要麼再被收編進入這一全球秩序，要麼就會消失無蹤。西方的使命（或者，應該說之前的西方使命，因為迄今已有很長一段時間，西方不再有自己的價值），就是透過任何可用手段，讓眾多差異文化屈服於無情的等值律則下。一個失去自身價值的文化只能對其他價值展開報復。甚至戰爭——例如，阿富汗的戰爭——最初的目標，超越政治或經濟戰略，是要將野蠻正常化，將其領土整頓定位。這目標就是鎮壓任何難以管治的地帶，殖民並馴化所有荒蠻的空

間，不管是地理上的空間，或心理上的領域。

全球體系的建制是強烈嫉妒的產物。這是一種冷漠、低清晰度文化對於高清晰度文化的嫉妒感；除魅的、弱化的體系對於高強度文化的嫉妒感；去神聖化的社會對於獻祭文化或形式的嫉妒感。

對這樣一個體系，任何難以管治的形式就是實際上的恐怖主義¹。這例子再次關於阿富汗：在一個特定地域裡，所有「民主」的自由和許可（音樂、電視，甚至女人的臉）都可以遭到禁制；一個國家能夠全然的堅持對抗我們所謂的文明（不管是什麼宗教原則召喚出的）——這些事情對其他的「自由」

¹ 我們甚至可以說自然災難就是一種恐怖主義形式。大規模的科技事故，車諾比（Chernoby）是其中一例，本身就帶點恐怖行動和自然災害的特性。印度波帕爾（Bhopal）毒氣外洩的毒害——科技的災難——可能也是一起恐怖行動。任何的空難事故都可說成恐怖團體所為。所有不合常理事件的特色就是可以將之歸罪於任何人或任何的一切。必要時，每件事看來都似乎是犯罪源頭的想像：甚至突如其來的低溫或一起地震。這並不新鮮：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數千個韓國人遭屠殺，因為他們要為這起災害負責。在一個像我們自己一樣整合的體系裡，每件事都同樣有著去穩定的效果。每件事都共同的說明了一個視自身絕不犯錯體系的錯誤。在一個體系理性的框架內，我們屈從於一切都已納入計畫的觀點下，我們可能會懷疑最慘重的災難是否就是體系本身的不可歸謬性（infallibility）。

世界是不可忍受的。現代性以及它的普世藉口遭到拒絕，那是無法接受的。做為一種顯明的善和人類的自然理想，不應該出現這種狀況。我們的習俗與價值的那種普遍性，竟會遭到質疑！在某些人的想法裡，這足以直接被打成狂熱分子——就西方共識的視域和單線思想而言，這也簡直就是罪行。

這種對抗只有在象徵性義務的角度下才能理解。要想了解其他世界對西方的恨意，我們必須翻轉平常的觀看方式。這不是一種我們從他們那裡取得所有東西、卻沒有回報他們任何東西的憎恨；這是一種我們給予一切東西、而他們卻沒有能力回報的憎恨。這不是那種剝奪和剝削的憎恨，而是羞辱的憎恨。9/11的恐怖事件正是對羞辱的回應：相互羞辱對方。

對全球強權而言，最慘的事不是遭到攻擊或摧毀，而是被羞辱。它被9/11事件羞辱是因為恐怖分子施予它某些東西，而這些是全球強權無法回報的。所有國家間的報復向來只是一種身體報復的體系，然而那一全球強權卻是象徵性的被擊敗。戰爭是回應侵略，不是回應挑戰。挑戰只有以羞辱回報另一方才能運作（但肯定不是把他炸得粉碎，或像狗一樣的把他關在關達那摩的戰俘營）。

所有支配的基礎是相互性（reciprocation）的闕如——在此我們仍以基本法則（fundamental rule）的角度談。單向的禮物是一種權力的行為。「善的帝國」，或善的暴力，真正的關鍵在於給予時的無任何相互性之可能。這是佔據上帝的位置。或者佔據主人的位置，主人允許奴隸以他們的勞力換取生存（然而勞力不是一種象徵性的互換，從此唯一的回應就是最後的反叛和死亡）。連上帝都留下獻祭的空間。在傳統秩序裡，以獻祭的形式，仍有回報神、自然或任何東西的可能性。這是確保生命體和事物之間的象徵性均衡。今天，我們不再有任何可以給予回報的人，不再有任何可以償付象徵性債務的人——那是我們文化的詛咒。在這文化中不是給予的不可能，而是回禮的不可能，因為所有的獻祭途徑已遭到抵銷和解除（留下的只是一種獻祭的諧仿，我們可以在當前所有受難性 [victimhood] 的形式中看到）。

結果，我們都處於接受的殘酷情境中，總是接受。現在，不是接受自上帝或自然，而是透過普遍化交換和普遍滿足的技術體系。所有東西都強有力的給了我們，我們有權利做一切事情，不管喜不喜歡。我們都處在一種被允許的生存，以及一種

無法償還的債務束縛的奴隸情境中。這一切能運作，長期以來要歸功於我們嵌進了貿易和經濟秩序的關係，但，在某一時刻，基本法則最後贏得成功。然而對這種正面的轉移不可避免的會得到一種否定的對反轉移（countertransference）形式的回應，以及對被俘生活、對被保護的生存、對生存的飽和的一種激烈發洩形式的回應。這種逆轉若不是採取公開的暴力形式（恐怖主義是其中一部分），就是採取我們現代性所特有的萎弱否認，自我憎恨、自責的形式——所有消極否定的熱情就是這種回禮之不可能的降格形式。

我們自身所憎惡的東西，我們妒恨的朦朧客體，就是這種真實的過度（excess），這種權力和舒適的過度，這種普遍的可得性，這種特定的滿足感——在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小說中，最後這偉大審問者（Grand Inquisitor）的命運留給了一群被馴養的群眾。這就是恐怖主義目前想在我們文化中譴責的——這也就是恐怖主義在我們之間找到的迴響以及它所施展的魅力。

恐怖主義依賴的是被羞辱者和被侮辱者的絕望，同樣的也依賴全球化的優勢受害者不可見的絕望，依賴我們自身所屈從

的整合性科技、壓倒性的虛擬真實、所屈從的網絡和程式的掌控，這或許呈現了整個人類內捲的面貌，人類成為「全球」內捲的面貌（人類支配地球其他物種，不正像西方支配其他世界嗎？）。這種看不見的絕望——我們的絕望——是我們的終端，雖然它產生於所有慾望的滿足。

如果恐怖主義，以這種方式，產生於真實的過度及其不可能的交換，產生於如此慷慨給予以至於無以回報，以及這種強迫式的衝突解決，那麼，視恐怖主義為一種客觀邪惡而必根絕之的觀念，就是徹底的幻象，因為，像這樣，它的荒謬性和無意義性，是這個社會留給自己的判決，是這個社會的自我譴責。

附錄 1

虛擬與事件性

Le Virtuel et l'événementiel

邱德亮譯

兩個景象：一個是技術官僚的青銅像，往他的手提箱前傾，坐在雙子星大廈腳下的長椅上，或應該說，被兩座樓垮下的灰塵所湮沒，就像龐貝（Pompéi）遺址找到的屍體一樣。它在那裡就像是事件的簽名，一個世界霸權被不可預知的災難打擊後悲愴的鬼魂。

另一個景象則是：雙子星大廈的工作室裡，製作此銅像的藝術家——被飛機穿過的身體——展示在世貿中心的教堂廣場上，就像現代的聖塞巴斯蒂安（Saint Sébastien）。

9月11日的早上他還在那裡工作，在那個他與其作品一起被事件帶走的地方，其作品還預示著這個事件。對一個作品的最高認可正是由摧毀它的事件所實現。

兩個寓言展現一個突如其來的非凡事件，一擊撕破被宣告終結歷史的單調。唯有事件方能享其美譽，切斷某種非事件（non-événement），在此非事件裡，我們都被世界秩序禁止不得干擾它。

在此將所有功能——所有的身體、時間、語言——都連上網絡為所有的精神做心理的輸液（perfusion mental）的階段，任何一個小小的事件都構成威脅，歷史本身就是一種威脅。

因此，必須發明一種安全的體系，足以預知任何可能入侵的事件。所有嚇阻的策略今日都握有普世的戰略。

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最近的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就是一個明例。以天生具有預感的腦袋（預測人[precogs]）為基地，預先偵測到即將發生的犯罪行為，警察突擊隊（預防犯罪小組[precrimes]）攔截並在他付諸行動之前制伏罪犯。

這是電影《觸靈》（*Dead Zone*, David Cronenberg）的另一版本：主角也是因為一場嚴重意外後具有預知的能力，最後以殺掉一個政客作結，因為瞥見他未來是個戰犯的命運。

這也是伊拉克戰爭的腳本：剷除胎中的罪犯，就算其犯罪行為（海珊使用大規模摧毀武器）沒有發生。問題當然不在於此犯罪是否真的發生了，而是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是否會發生。因此，問題在於真實地壓制一種虛擬犯罪。

就推論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在戰爭以外，一種有系統的反策劃（déprogrammation）正在繁衍，不僅所有犯罪，還有那些會干擾事物秩序和全球警察秩序的一切。

這正是當前「政治」權力所總結概述的推論。此非出於某

種正面的意志，而僅是一種嚇阻的負面權力，公眾衛生和安全性、免疫性、預防性的警察的負面權力。

此種策略不只運行於未來，也運行於過去的事件——例如 9/11 事件，其中它試圖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來抹去羞辱。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種戰爭終究是個誘餌，一個虛擬的事件，一個「非事件」。去除了目標和目的本身，這種戰爭只不過是一種祛邪的形式，一種除魔法術。這也就是為什麼它將永無止盡，因為我們將永遠無法終止驅除這樣的事件。說是預防，而事實上只不過是回顧，它力求平息 9/11 恐怖分子的事件，其陰影籠罩著整個全球性控制的戰略。

清除事件，消除敵人，消除死亡：「零傷亡」(zero mort) 的強制就是為安全而著魔的強迫性行為。

這種世界秩序所處心積慮想達成的是決定性的非事件。某種歷史的終結，倒不是像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所說的，基於民主實現的歷史終結，而是一種預防性恐怖的歷史終結，因為反恐怖而終結所有可能的事件。霸權所施加的恐怖，最終將在安全的符號之下，施加於其自身。

在此有著一種很凶暴的反諷；世界反恐怖主義的體系，以

內化恐怖獲得終結，將恐怖施於其自身並掏空所有政治的實質——直到反過來對抗它自己的人民。

此乃冷戰和恐怖均衡的痕跡？但這次卻是沒有冷戰的嚇阻，沒有均衡的恐怖。或者應該說這是一場無所不在的冷戰，粉末般地滲入社會與政治生活任何可能的縫隙。

這種權力急急忙忙進入自己設下的陷阱，在莫斯科劇院達到戲劇性的高峰，人質和恐怖分子在大屠殺裡血肉交融。完全就像狂牛病症候群，為保險起見屠殺整個牛群——只有上帝才分得清楚。或像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分不清死者，將他們當做可能的共犯（電影《關鍵報告》亦是如此，推定為罪犯的，即使事後證明無罪，也在預先就被制止了）。

而事實上此正是目前處境的真相：不管如何，人民本身對權力來說都是一種恐怖主義的威脅。也是權力它自己，透過鎮壓非自願地鞏固了這種共謀。在此鎮壓中的等量關係透露出我們都是權力潛在的人質。

若繼續推論，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所有權力聯結起來對抗所有的人民——我們已經在伊拉克戰爭時淺嚐到了先味，由於它之所以可以發生，乃是因為所有權力多多少少偽裝的同

意，漠視全世界的公眾意見。而且，如果世界性的示威反對這場戰爭可以給出一種制衡權力的假象的話，它尤其展現出這種「國際社群」面對美國的真實政治的微不足道。

在此所牽涉的是一個霸權施展其權力的純粹狀態，完全不必憂慮主權和代表性的問題，也涉及一種負面權力的「全面真實」(Réalité Intégrale)¹。一旦可以代表性拿出主權，一旦存在著政治的理由，權力都可以找到其平衡——無論如何，它都可以被打敗或被質疑。然而，這種主權的刪除卻留下空位給一個毫無節度、沒有抗衡力量的野蠻權力(一種科技的野蠻，而不是自然的野蠻)。而且經過一段奇怪的迂迴，回到原始社會的某些東西。在此社會裡，權力不被承認。依據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的說法，一種沒有歷史的社會。我們當前所處的全球化社會，在全面性權力(pouvoir intégral)的陰

¹ 此書的第一章〈全面性的真實〉，布希亞解釋：我稱「全面真實」(Réalité intégrale)，一個軍事行動計畫在這世界上橫行無阻，一切都變得真實，一切都變得透明可見，一切都被「解放」，一切都實現了，而且一切都有一個意義(或說意義的乾淨／專有／本義 [le propre du sens]，就是沒有意義)。「La réalité intégrale」, in *Le Pacte de lucidité ou l'intelligence du mal*, Paris, Galilée, pp. 11-17. [中譯註]

影下，是否又變回一個沒有歷史的社會？

然而，權力這種全面真實也是其本身的終結。一個只立基於預防與事件警察的權力，一個沒有任何政治意願而只致力於趕走幽靈的權力，自己也變成了幽靈且脆不可擊。其虛擬的強勢——以程式性、指數性、設計性等辭彙計劃出來的強勢——的確是非常完美，結果反而使自己無法進場，否則各種內部的毛病將反過來對抗自己。站在主宰的最高峰，不得不失去面子。

此乃，「權力之地獄」(Enfer du Pouvoir)也！

事件的警察本質上是由資訊本身來擔保。資訊打造一個歷史去真實化 (déréalisation de l'histoire) 最有效的機器。就像政治經濟學是製造價值的龐大機器，製造財富的的龐大機器，倒不是財富本身，而是財富的符號。於是，整個資訊系統其實是一個將事件當成符號大量生產的龐大機器，並將之變成在意識形態、秀場、災難等的普世市場 (marché universel)² 交換的

² 注意布希亞對普世 (universel) 和全球 (mondial) 的特殊定義及其差異，見 “le Mondial et l'universel”, *Ecran total*, Paris, Galilée, 1997, pp. 175-179。[中譯註]

價值，總之，就是生產非事件。資訊的抽象化與經濟的抽象化相同。而且，就像所有的商品一樣，多虧價值的抽象化，使它們之間可以交換，因此所有的事件也都可以在資訊文化市場上相互取代。事件的獨特性，使它成為事件，無法被簡化成編碼轉寫和佈局的獨特性，就這麼簡簡單單地消失了。

我們進入一種領域，在此領域，事件因其「即時」(en temps réel) 被生產和發佈，已經不再千真萬確地發生了，且完全消逝在資訊的真空裡。

資訊層像是一種空間，在掏空事件的實體後，重新創造一種人造重力，再將它放到「即時」的軌道上。而在這軌道上，又在歷史性地去活力化之後，將事件拋擲到資訊的超政治秀場(scène transpolitique) 上。

非事件不會在沒有事情發生的地方！

相反地，這是一個永遠在變動的領域，沒得喘息的現實化(actualisation)，並以「即時」毫無間歇地前仆後繼。結果形成全面性的等值，冷漠以及平庸，這些正是事件零度的特性。

無休止的升級超越、經濟成長或是流行時尚亦是如此。時尚尤其同時整合了強迫性改變和汰舊衝動的最佳領域。整個時

尚模特兒企業引發一種差異文化，終結所有歷史的連續性。事物不再於歷史的軸線上進展，而是在真空中前仆後繼。論述和影像泛濫，我們卻毫無防衛能力，只能被簡化成像戰爭迫近時一樣無力和嚇呆的等待。

這不是一個混淆視聽和酗酒中毒的問題。而是FBI愚蠢的錯誤，天真地想創立一個假消息機構（Agence de Désinformation），目的在於操縱和主導——全然無用的舉動。因為混淆視聽來自於資訊的泛濫本身，來自於其咒語和其狗咬尾巴的重複，並創造一個真空的認知磁場，一個分離的空間，像中子彈一樣，將周遭的氧氣都吸光。透過影像和評論的旋轉推進，一切都事先被制服了，包括戰爭。然而也許終究一件事的進行沒有什麼好說的，像這場戰爭完全依照一個無懈可擊的腳本進行，在達到最終結果的途中，沒有一絲不確定的閃光。

在媒體層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這種由立即回覆影像所產生的事件短路。

資訊永遠已經在那裡。萬一有災難發生，記者和攝影師已經在援救人員來到之前到達。如果可能的話，他們還想在災難發生以前到達現場，若能製造或引發事件最好，這樣就有第一

手消息。

這種操盤尤其在五角大廈帶頭的「事件股市」(Bourse des événements) 達到頂點，將爆炸案和災難像在股市一樣開價叫賣。你和那些不相信的人賭它發生的可能性。

這種投機市場讓我們想起大豆和蔗糖期貨市場的運作。我們大可以對非洲愛滋病受害者的數量操盤，或對聖安地列斯斷層 (faille de San Andreas) 賭它崩落的可能性 (又是一樁五角大廈帶頭的勾當，以便讓投機的自由市場相信他們的預測能力會比情報局強)。

當然，這與一開始的不法行為只不過一步之差而已：在引發事件發生之前下賭注畢竟還是最確定的 (據說賓拉登於9/11前夕在TWA [環球航空] 炒過股票)。就像在謀殺妻子之前先幫她買人壽保險一樣。

在歷史時間中突然來到的事件與在資訊的即時中突然來到的事件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在全球解除管制的名義下走向流通與市場的純粹管理，相呼應於「全球性」的事件，或應該說全球化的非事件：世界盃足球賽、千禧年、黛安娜王妃之死、駭客任務 (Matrix) 等等。

不管這些事件是否是製造出來的，但全都是由資訊網絡無聲的傳染病所操弄，仿冒的事件（Fake event）。

法蘭西德·貝納（François de Bernard）也分析伊拉克戰爭像是電影理論與實作純然的移花接木。讓我們在摺疊椅上豎髮痠癢的，不是「像一部電影一樣」，精確地說，它本身就是一部電影。只不過依照編劇、腳本拍戲，不離太遠。

演員、技術支援和贊助人們鉅細靡遺地設計：這是專家幹的勾當。包括消息的發佈以及發佈管道的掌控。終究，軍事行動的戰爭變成一齣超大型的特效，電影在此變成戰爭的範式，而我們卻把它當做「真實」來想像，其實只不過是攝影藝術存在的鏡子而已。

因此，戰爭的虛擬性不是個比喻，而就是真實在虛構之中的過渡，或應該這麼說，從真實到虛構立即的變形。真實只不過是虛擬漸近的地平線。

再說，在這段歷史裡參與演出的不只是真實的真實性，也有電影的真實性。有點像迪士尼：遊樂園只不過是個託詞——以掩飾整個生活的脈絡早已迪士尼化的事實。

電影也是如此：今日生產的電影不過是攝影技術形式可見

的寓言，征服了所有的東西，社會與政治生活，景致、戰爭等——生命全面編劇化 (scénarisée) 的形式。

而且根本不用懷疑電影的消逝，因為電影已經在真實裡上演了。真實在電影的威脅之下消失了，電影也在真實的威脅之下消失了。致命的輸血使得雙方都失去其特殊性。

若我們將歷史當做一場電影——不論我們願不願意都已經是如此了——那麼資訊的真理則由歷史電影的事後共步處理 (postsynchronisation)、配音和字幕所構成。

不久將在前西德首創一個遊樂園，重建安排已故東德氣氛的場景（稱之為「東德懷舊風」[ostalgie]³）。整個社會就這樣活生生地（它並還沒完全死）被悼念。

擬像 (simulacre) 不只是因為與時事互相滲透 (télescoper à l'actualité)，也是因為給出一個印象，「真實」只有在「即時」裡才會發生，甚至不必透過現在和歷史。

結果，這種印象再度變成我們懷舊的對象，而且我們看見

³「東德懷舊風」(ostalgie)，這字來自於「東」(ost)和「懷舊」(nostalgie)之組合。[中譯註]

歷史的慾望、平反和紀念的空間 (lieux de mémoire) 到處如花亂放——就好像所有人都在忍受，我們卻兀自強迫餵養這歷史的終結。

歷史，也超越其自身目的／終結運行。

以前歷史事件有一個定義，法國大革命是其範例，而且事件和歷史概念本身似乎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在此定義下，我們可以將事件分析成連續進程的最強點，而且其不連續性本身也屬於整體辯證的一部分。

隨著世界秩序的囂張猖狂，這種事件的定義已不復往昔。世界秩序排除了所有的意識形態，唯一關注的就只是網絡與通路的流通。一切啟蒙時代的目標與價值都在此全面化的流通之中消失了，而這些價值卻曾經是源起。因為曾經有著一個理念、一個理想、一個現代性的想像，但這全都在加劇的經濟成長中消失了。

曾經是屬於歷史的，就像曾經是屬於真實的。

曾經有著一個真實的原則。但這原則已消失，而真實，從它的原則解放出來，卻仍以慣性往前跑。真實以指數的方式自行發展，變成**全面真實**，毫無原則，毫無目的，只自滿自足於

全面性地實現所有的可能性。連其自己的烏托邦都吞沒了，超越其本身的目的運行。

然而，歷史的終結並不是歷史最後一個說話的人。

因為，在永續的非事件深處，另一類的事件繁衍起來。斷裂的事件，不可預知，無法以歷史的辭彙分類，超乎歷史理性的事件——這種事件自己生成，以對抗其自身的意象，對抗其自身的擬像。打破媒體輪番上演枯燥無味的時事，但它不因此表示歷史的東山再起，也不屬於瓦解虛擬核心的真實（像我們所說的9/11）。不在歷史之中構成事件，而是在歷史之外，在其目的之外構成事件。在一個終結了歷史的系統之中構成事件。它們是這體系內部的痙攣／激變（convulsion）。結果，它以邪惡勢力的姿態出現，不再是建設性的失序，而是絕對的混亂。

這種在其獨特性中的無法解讀，不下於體系在自身的擴張和事前脫逃一樣誇張得無法解讀。

在此新世界秩序裡，不再有革命，只有激變。就像一個致力於完美的機器，其體系太過完整，不再有危機，只有功能失常、缺陷、故障和動脈瘤破裂。

然而，這卻與意外不同。

意外只不過是個徵兆，一個間歇性的功能失常，一個技術（或自然）秩序的失調，我們還可以預知：這正是當前所有風險和預測的政治正在做的。

事件，它是會反擊的，而且透過一個奇異的靈感，在整個體系運轉到頂峰，達到完美時，引入內在的負面性和死亡。它是強權回過頭來反擊自己的模式，彷彿整個體系在構築其強勢時，祕密地豢養一個邪惡精靈（malin génie）看顧著這種反擊。

正是在此意義下，事件與意外不同。我們無法預測，因為它不進入任何可能性的遊戲。

馬克思對革命與共產主義的分析為我們當前的處境提供了幾個很好的對照。他也將普羅大眾當做資本終結的歷史承載者——某種意義來說，他的邪惡精靈。因為普羅大眾的日益壯大，資本誘發了其自身毀滅的內在病毒。

可是，共產主義的幽靈與恐怖主義的幽靈卻有根本上的差別。因為資本權力的展現是將它所攜帶的分化酵母轉化成一個可見的敵人，一個階級的對手。因此在商品剝削之下，將這歷

史的運動變成一種向更先進資本階段邁進之整合動力。

恐怖主義則在激進的層次上又魔高一丈。它不是一個歷史的主體，而是一個抓不住的敵人。如果階級鬥爭引發一連串的歷史事件，恐怖主義則引發了另一類型的事件。全球霸權（已經不完全是資本）處在直接與自己交鋒的處境。從此以後，它所面對的不是共產主義的幽靈，而是它自己的幽靈。

因此，革命的終結（和歷史總體而言）一點也不是全球霸權的勝利。反而將會是其厄運之徵兆。

歷史曾是我們強烈的假設，一種最大密度的歷史。

轉變，相對於一個最小密度，一切都相繼地相互抵銷，直到重新達到一種全面性的穩定不動的對等值：這種感覺，就算在現今動盪不安的年代還是沒有改變。

這種全面性的交換，通路、網絡、普世傳播的交換，到達一個我們早已超越的臨界門檻，到達其自身的否定，而這已經不再是個簡單的危機，而是一個災難，一個粗暴的內捲衰退（involution），尤其在我們稱之為「真實率趨勢下降」（*baisse tendancielle du taux de réalité*）特別敏感（同樣，資訊的泛濫與成長率趨勢下降相符）。

在全面性對等值之中，價值的零度。

全球化以為毫無誤差地 (*sans défaut*) 制服一切朝向秩序而來的衝突——但這秩序的設定值 (*par défaut*)，就是將一切都等值於一個加總等於零的公式。結束辯證法，那種正與反在合之中相互解消的遊戲。從此以後，相峙的兩個關係都將在所有衝突的平均化中相互抵消。然而，這種抵消／中和 (*neutralisation*)，將輪到它永遠不會有結果，因為所有辯證解決方案都消失的同時，總是有絕境在步步高升 (*montée en puissance des extrêmes*)。

不再有漸進的歷史，一種有主導性提綱的歷史，也不會有經由危機解決的調節。不再有理性的連續性，也不再有的衝突的辯證法，只會有絕境的共享。一旦普世 (*l'universel*) 被世界性的霸權所摧毀，歷史的邏輯也會被變動的暈眩所刪除。只剩下一個虛擬的全能霸權，與那些深痛惡絕的人面對面的大對決。

是以，世界強權與恐怖主義的頑拮對峙——美國霸權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現今的較量，不只是這種強權的全面真實與同一個強權全面抗拒之間決鬥的明顯突變。

不會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在此對峙的兩造之間將不會有

停戰的可能，也不會有一個整合秩序的可能性。

也永遠不會有思想的停戰，因為它深痛惡絕地抗拒著。這種意義的事件也不會終戰：這些事件最多只會罷工一段時間，然後又會突然地蜂起。

這在某種意義來說卻很令人安心：善之帝國，如果是不能被打敗的，也就注定是個永恆的失敗。

必須保留事件的基本定義及其在想像中的影響力。其特徵卻是非常弔詭的，令人不安的怪異：某種不太可能或不可能的東西突然爆發，和一種令人不安的熟悉，它一出現就非常明顯，彷彿已是命中注定，好像無法不發生一樣。

在此好像某些東西來自其他地方，某些宿命的東西，無法預測。就這樣，非常複雜又矛盾，以如此強大的力量動員起想像力。打破了事物的連續性，同時又以令人驚訝的流暢進入真實之中。

這正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感受。大戰其實在爆發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同時像可能發生又像不可能（與伊拉克戰爭之懸疑完全相同），而且同時引發為某種驚愕的情緒發現其發生的可能性如此巨大，從抽象過渡到具

體，從虛擬過渡到真實如此之容易。

同樣的矛盾，混雜著愉悅和恐懼，或多或少不願明言的情緒，在9/11事件裡可以找到。

這種情緒，在某件事情發生之前，不論它是否可能，就已經抓住我們了。

一般而言，事情的發生必須先有可能性，然後才會實現。此乃邏輯與歷時（chronologique）的秩序。然而，若是如此，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事件。

這卻是伊拉克戰爭的情況，如此完美的事先準備、計畫、預測、指示與動員，以至於在發生之前就已窮盡所有的可能性。這場戰爭已是如此可能，以至於不需要發生就已經發生了。在此戰爭裡，已經不會有任何事件，已經不會有任何在9/11這個徹底的事件中所帶來的興奮與恐懼，類似於康德所謂壯美（sublime）之情緒。

戰爭的非事件，只留下一種神秘化與噁心的情緒。

在此必須介紹某種類似於事件形上學的東西，我們依舊可以從柏格森處找到一些線索。

就像問到一個偉大的作品是否可能出現時，他回答說：

「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還不可能，它將成為可能，一旦它將出現以後；一個有天份的人或一個天才突然出現，創造出一個作品——這樣真實，甚至因此這作品成為回顧性的、追溯性的可能。」

想像置身於事件，這意謂必須要先從無到有地發生某種不可預知的東西，之後我們才能想像成可能的。這正是時序上的矛盾，倒置的時間性決定了事件做為一個事件。

習慣上，我們構想一條降幕線從不可能到可能，然後到真實。然而，決定一個真正事件的，正好是真實與可能判斷同時性地突然發生（advient），且對此之想像力是立即的。但是這是活生生事件、活生生時間性的秩序，一種來自於時間深度已完全不存在的即時之中。

即時，就是對時間所施加的暴力，對事件所施加的暴力。以其虛擬的立即性和其模式的推進，所有時間場域之深度，所有起源與終結之深度被拿掉——失去了一直都存在的時間間差，只為了立即和決定性的時間（le temps immédiat et définitif）。

只要將一切都集中在一個立即性的時事，並加強所有通路

和全球所有據點的同時性，以便將時間減少到它最小、最簡單的單元：瞬間（instant）。此瞬間甚至不再是「現在」的瞬間，而是在其全然的抽象裡，體現時間的絕對真實，以此壓倒所有事件的突然入侵和死亡之可能性。

此乃連續不斷的通訊，資訊和介面互動的「即時」：時間與事件最好的嚇阻空間。在即時的螢光幕上，只要按照著鍵盤簡單操作，所有可能的都虛擬地實現——也同時終結了它們的可能性。透過電子化和位元化（cybernétique），所有的慾望、所有的認證遊戲、所有的互動介面的潛在可能性，都已經被預先設計和自動設計了。當所有的這些一下子全都實現的時候，就會禁止某種獨特事件的浮現。

這正是即時的暴力，也是資訊的暴力。

即時將過去非物質化了，也將未來非物質化，將歷史時間非物質化，摧毀了真實的事件：猶太人大屠殺和千禧年將不曾發生，也將不會發生。

它甚至消滅了新聞裡出現的事件，只不過是立即性傳回的影像而已。

於是，新聞資訊混雜著時事，在場的假象——這正是實況

世界的媒體假象，也是真實事件消失的地平線。

在此出現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旦新聞資訊是收受者（partie prenante），所有我們接收到的影像在事件的真實上便有其不確定性。

但一旦新聞資訊是同時現象開展的收受者又是參加者（partie prise）時，那麼新聞創造事件。是新聞的事件取代了事件的新聞。

事件的歷史時間，感受的心理時間，判斷與意志的主體時間，真實的客觀時間——所有的這些都同時間在即時裡受到質疑。

若昔日曾有著一個歷史主體、一個知識主體、權力主體——所有的這些都在即時中被刪除消失，距離和距離的悲情，也在新聞資訊的世界全面實現裡消失。

在事件發生之前，要說它可能一切都還太早了。

在事件發生之後，要說它可能一切都又太遲了。

對再現（représentation）一切都太晚了，卻沒有人會了解到這個事實。以9/11為例，它首先發生了，然後才被這樣的可能或那樣的原因所追補，被企圖解釋的所有論述追補。但是再

現也和在它發生前的預測一樣不可能。於是，CIA的專家早已掌握了此一爆炸案所有可能的資訊，但是他們卻一點兒也不相信。此乃超過了想像力。像這樣的事件永遠都超過想像力。它也超越了所有可能的因果解釋（也許甚至連因果，根據伊大羅·斯維沃 [Italo Svevo] 的說法，也不過是阻礙存在世界以其方式存在的誤解？）

因此必須透過新聞事件的非事件才能偵測到抗拒事件的東西。找到某種事件的「活貨幣」（*monnaie vivante*）⁴，並做一個文義分析，以對抗所有評論部署和只會取消（*neutraliser*）事件的作戲佈局。

只有解脫新聞資訊（和我們）的事件，才能創造令人驚異的靈感。只有這種事件才是「真實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解釋它，一切在想像力裡的才能給予接待。

在我們心中有一種對事件的巨大慾望。

以及巨大的失望，因為新聞的內容令人失望地不如其強大

⁴ 關於此一概念請見作者的另一篇文章“*La Monnaie vivante : Singularité du phantasme*”，in *L'Echange impossible*, Paris, Galilée, 1999, pp. 155-166。[中譯註]

的傳播能力。這種不對稱產生出一種隨時準備撲向任何一個小小意外和結晶於任何一個災難的嚴格要求。而且在某某情境（黛安娜、世界盃）攫住群眾的情緒感染，沒有其他什麼理由。這無關於窺視慾或情緒的發洩。而是對不道德情境的自發反映：新聞的過多創造了一種真實事件無以倫比的不道德情境。自然而然的，我們想要一種極端的事件，一種致命的事件——以補償被新聞普遍平庸化的生活。我們夢想荒謬的事件，使我們從意義的暴政和因果的限制之中解放出來。我們同時生活在意義過多的恐怖和全然的無意義之中。

於是，在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貧乏脈絡之中，過度的事件相當於——根據李維—史陀——語言中能指的過度，使它以象徵性功能建立起來。

事件的慾望，非事件的慾望：這兩者無疑同時發生，也都一樣強大。

自此，狂喜混雜了恐怖，祕密亢奮混合了內疚。對不可預知的亢奮不下於對死亡的亢奮，而我們對這兩者都如此地貪愛。

所有的辯詞只不過在掩飾這種曖昧的事件慾望，更精確地

說，應該是事件秩序的動盪，不管是它是什麼。

完全瀆聖的惡之慾望突然爆發，也渴望以全然無法辯解的事件（像是天然的災害）恢復一種祕密的規則，以重建善與惡之平衡力量。

我們所有的道德抗議都相匹配於惡勢力自動返回時所產生的不道德狂熱。

黛安娜被說成是「作秀社會」（société du spectacle）的受害者，而我們都是她死亡被動的窺視狂。然而，黛安娜之死所牽涉的是一個比這更複雜的劇本，一個集體的編劇，（以曝光來說）連黛安娜自己都不是無辜的。在黛妃公私生活實實在在的真人秀裡，大眾當然扮演立即的角色，其中媒體則是介面。獵私生活的狗仔隊只是個媒介而已，透過媒體這個致命的介面，以及在他們背後，我們所有人都是慾望媒體新聞的通路和導體的電子——大眾即是媒體（médiuM）。於是不再有演員與觀眾，全都湮沒在同一個真實裡，同一個大變革的責任之中，同一個命運，其實只是一個集體慾望的實現。再一次，我們又離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遠：我們都是新聞資訊的人質，但我們卻暗地裡允諾此一人質的綁架。

同時我們又非常強烈地渴望事件，不管是哪一個事件，只要是非常的事件，我們也都熱情地渴望沒有什麼事發生，事事物物都在其應該的秩序之中，甚至付出對存在感到不滿的代價，直到這種不滿無法忍受，從此展開突出的癱瘓和相反的情緒：狂喜和恐怖。

從此也推展出兩種類型的分析：一類是回應事件極端的獨特性，另一類的作用則是將它貧乏化，一種正統的思考和一種矛盾的思考。在此兩者之間，再也沒有單純批判思考的空間。

不論我們想不想要，現在的處境已變得激進。而若我們認為這種激進是惡的激進——倘若此惡是中介調停之消失，以使兩個極端的對峙——那麼應該為這種處境拿出行動，面對惡的問題。

沒有誰輸誰贏的賭注。

我們都感受到事件與非事件同時的吸力和推力。完全像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在任何行動中，我們都遭遇不可預知的和不可挽救的。

然而，今日不可挽救的已是虛擬對這個世界的支配，科技「檢查」（arrondissement）的全面掌控，已是預防與絕對安全

技術的暴政。不可預知留給我們的只有事件的機會。

再來，就像馬拉美（Mallarmé）曾說過的，骰子一擲並不會廢除偶然——也就是說，就算它達到機械自動的完美，這最後一擲還是不會結束偶然。

一旦無法避免的事件一天不消失，將永遠無法達到科技完美和絕對預防的那一點。

驚愕到令人憂心的事件也將永遠有機會對抗無聊到令人憂心的世界秩序。

最美的隱喻應該是在2001年9月面對曼哈頓半島安置攝影機的影像藝術家，為了拍下什麼也沒發生的事實，拍攝非事件。

就這樣，伴隨著雙子星大廈，那平庸乏味在他的攝影機前炸毀！

* 本文譯自Jean Baudrillard, *Le Pacte de lucidité ou l'intelligence du mal*, Paris: Galilée, 2004, pp. 99-116。

附錄2

戰爭的色情

Pornography of War

黃宏昭譯

世貿中心：是對強權的電擊，是對強權的羞辱，不過那是來自外部。更糟糕的是巴格達監獄（阿布格萊卜）的影像。這是一種羞辱，象徵性來說同樣致命：世界強權——碰巧以美國為其形式——施予自身的羞辱。羞恥的電擊和心虛。這就是這兩起事件是如何聯繫起來的道理。

整個世界對這兩起事件的劇烈反應：第一起是重大感，第二起是賤鄙感。

以9/11來說，那是一起重要事件的顫慄影像；另一起呢，跟事件正相反，是個帶著某種羞恥影像的非事件（non-event），一起猥褻庸俗的非事件，殘暴而庸俗降格的，不只是受難者，還有這齣暴力諧仿劇（parody）的業餘舞臺管理者。因為此事最糟糕的就是我們對暴力的諧仿，對戰爭本身的諧仿，色情正逐漸成為戰爭最後的賤鄙形式，這種無能進行純然戰爭，無能進行純然殺戮的戰爭，被歹戲拖棚成一種幼稚的、愚怖王式（*Ubuesque*）的「真人秀」，一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權力擬像（*simulacrum*）。

這些場景就是權力的圖解插畫，當權力達到它的極致時，對它自身不知所措的模樣；也是權力自從所向無敵而且任何行

徑都不受懲罰以來，拔劍四顧心茫茫的那副德行。權力目前所能做的就是施以無端無故（毫無必要）的羞辱，而且就我們所知，我們施予他人的暴力只是對我們自己施予暴力的表現。權力只能在這過程裡自我羞辱，在一種變態的殘酷形式中自我降格和自我否定。羞辱和低俗是一個強權對自己不知所措的最後徵候。

9/11 就像是所有那些對這個世界強權不知所措——也不再能忍受——的人們的一種全球反應。而對伊拉克人濫刑這個案例，則更糟糕：除了非人的自我醜化，強權已經對自己不知所措，也不再能忍受其自身。

這些[虐囚]影像對美國的致命性一如火光烈焰中的世貿中心畫面。然而，遭到控訴的不是美國本身，也沒有理由把這一切歸咎給美國：詭雷衍生出自己的動力，實際上如同自殺行動那樣不受控制的（放空檔）自由滑行。事實上，對美國來說，他們已擁有太多的權力。他們不再有祛除它的方法。而且我們也都參與了那一權力。在這些影像中結晶顯影的是整個西方的心虛。正是這整個西方被呈現在美軍虐囚的娛虐爆笑中；正如這整個西方躲在以色列城牆建物背後。

這正是這些影像的真理；這是它們的負擔：權勢的過度令其自身顯得鄙賤與淫色。影像的真理，並不在於他們的真確性，因為在這個情況下，[圖片]真假與否不是重點。何況今後，我們將永遠處在一種對所關注的這些影像不確定的狀態中。只有影響力才是重點，正因為它們嵌入戰爭之中。甚至不再需要「隨軍記者」(embedded journalists)；而是軍方本身嵌入了影像之中；拜數位科技之賜，影像毫無疑義的已經整合進入戰爭中。它們不再再現，它們不再意味著判斷的距離或是知覺。就嚴格的意義來講，它們不再屬於再現的層次或資訊的層次，其結果，不管它們是否應該被生產、複製、播放或禁止的問題，以及它們真假與否的基本問題，都無關緊要了。

因為若要影像構成真正的資訊，它們必須與戰爭有所區別。但它們已真的變成像今日戰爭一樣的虛擬，而且它們自己特殊的暴力如今又添加上戰爭的特殊暴力。再者，因為影像的無所不在，因為任何東西都必須變得可見的律則，而這律則目前通用於全世界，這些影像——這些我們所談的影像——已經成為實質上的色情；它們因此自然的拼插入戰爭的色情層次。

在這整件事情裡，特別是最近發生在伊拉克的插曲中，自

有其正義公道：那些將所有賭注押在景觀上的人，將因景觀而死。假如你想要藉著影像求取權力，那麼準備好影像倒播的時候就得倒楣該死了。

透過痛苦的經驗，美國正在學到教訓，也將持續學到教訓。儘管所有「民主的」藉口，儘管一個令人沒輒的透明擬像相當於那令人沒輒的軍力擬像，這是個教訓。是誰幹下這些行為且誰要真正對它們負責呢？是軍方高層嗎？還是如我們所知的是人類本性的殘酷——「甚至在民主中」？真正的醜聞不在於虐待，而在於那些知道實情且保持沉默的欺偽不實者（不然還是那些洩露此事的人？）。無論如何，整個真實的暴力被轉移成公開坦承的問題，透過公開它的惡行，民主找到了一條恢復自己德性的道路。

撇開這些不論，這些活生生賤鄙畫面的祕密是什麼？再次的，這是回應，超乎戰略和政治的變動，它們是對9/11羞辱的回應以及企圖透過一種比死亡糟糕、遠遠更糟糕的羞辱方式做為回應。套上頭罩本身就是一種斬首的形式（對美國人的斬首依稀與此相呼應），即使不把頭罩算上，即使不把層疊堆積的身體和軍犬算上，被迫脫光衣服本身就是一種強暴。例如，我

們看到大兵牽著上著鎖鍊的伊拉克人在街道上遛著，以及在派翠克·狄卡瑞（Patrick DeKaerke）的短篇故事〈Allah Akhbar〉中，我們看到在現場的CIA人員法蘭克（Franck），也命令阿拉伯人脫光衣服，強破他穿上女人的短衣以及網狀長襪，最後讓他跟一頭豬獸姦，不斷拍下來的照片，則寄送給這村莊以及這男人的家人和朋友。以這種方式，「他者」遭到象徵性的消滅。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戰爭的目標並不是殺戮或打贏，而是滅除敵人，去遮黑（這個說法我想是來自卡內提[Canetti]）敵人天空中的亮光。

事實上，我們想要讓這些伊拉克人招供什麼？我們試圖從他們那裡逼出什麼祕密？我們很簡單想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以及憑何方神名而不怕死。這說明了「零傷亡」士兵對那些不怕死者的深深妒嫉，以及進行報復。這就是何以他們用比死亡更糟的方式懲罰伊拉克人……用徹底的羞恥、裸身的羞辱，撕毀所有的面紗，我們又回到公開和透明的老問題上來：扯掉婦女的面紗或者令男人套上頭罩，讓他們看來更赤裸、更猥褻……以戰爭恥辱來壓軸的是這整場的化裝舞會，以真正的變裝秀出現——以最殘暴的影像（對美國而言最殘暴），因為

它激起更多的魅影，同時也最具可逆性——扮裝成受電刑威脅的戰俘完全化身成為一頂頭罩，化身為三K黨徒，以這種造型釘上十字架。這真是美國對自己施行了電刑。

* 本文譯自 *Cultural Politics*, 2005, Volume.1, Issue.1, pp. 23-26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恐怖主義的精靈／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著；
邱德亮、黃宏昭譯。--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
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6 [民95]
面：公分。-- (理論與當代戰爭系列；3)
譯自：L'esprit du terrorisme
ISBN 978-986-7252-36-4 (平裝)

1. 恐怖主義

571.73

94009042